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齐奥朗:活在火焰之中

在滨河街的日子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日关系

——兼谈19世纪末20初叶日本对华“民间外交”

伟大的二流国家

——欧洲的危机和新生

那些消逝的艺术杂志

城市光影两则

哲学、传统与教化

——与Vittorio Hösle教授的访谈

革命叙述的兴起

——高华访谈



2011年9月 第5卷第8期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執行編輯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汪伟 扬克 孙骁骥 灵子

轮值編輯

扬克

观察員

写作: 朱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良(北京)
严飞(美国·旧金山) 刘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扬克(德国·图宾根) 孙传钊(上海)
燕舞(北京) 灵子(北京)
吴强(北京) 言一(成都)

翻译

吴万伟(武汉)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

2011年9月 第5卷第8期

总第48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 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 观点尊重个人趣味, 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 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 对于相关部分, 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 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 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 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 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 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 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 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 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辛亥百年纪念，正如本刊执笔成庆所说，当下所有相关的叙述与评论都不是远距离的回望，而是在在暗指眼前。尽管经历了无数革命带来的腥风血雨，但“革命”一词显然并不打算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此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地带华尔街，“Revolution”的标语就正在四处飘荡。而一本法文的匿名手册 *L'insurrection qui vient* 也以“革命将至：资本主义崩坏宣言”这一耸人听闻的翻译吸引了中文世界的关注。不过在西语中，源于拉丁语 *revolvere* 的 *revolution* 一词并不必然与暴力相关，在中古拉丁语中它最初指的是行星运行的转向，到了近代才被赋予政治-社会含义，意谓一种体系性的倒转，是对既有权力结构的革新，中文“革命”一词本身也并非如字面给人的误解，是“革除性命”之义，而是旧命鼎革之谓。

革命源于人对另一种可能的生活和组织方式的想象与希望，只要人是一种会希望的动物，革命话语就不会从我们的生活图景中告别，这些话语落在个人生命史中时，就会在积极意义上提醒人们：不，可以不这样，

还有另外的生活可能。

勘误：

上期《“决非偶然之事”：哲学与公共生活》一文中图3《欲望的治疗》并非 Nussbaum 新作，而是新版。



目录

封面用图

Elvis&Gun

Andy Warhol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写作 • 朱航满
思想 • 成庆
文史 • 王晓渔

001-021

书评

• 凌越
齐奥朗
——活在火焰之中

• 戴新伟
在滨河街的日子

025-034

随笔

• 刘柠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日关系
——兼谈19世纪末20初叶
日本对华“民间外交”

• 吴强
伟大的二流国家
——欧洲的危机和新生

035-041

艺术

• 刘柠
那些消逝的艺术杂志

• 言一
城市光影两则

042-051

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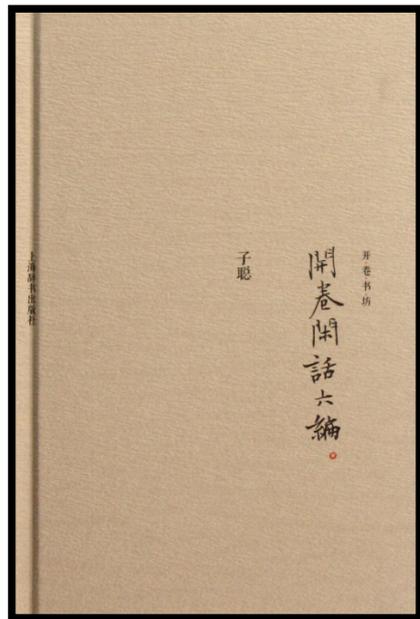
• 黄晶
哲学、传统与教化
——与Vittorio Hösle教授的访谈

• 灵子
革命叙述的兴起
——高华访谈

052-065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gmail.com)

不知什么时候，一些爱书人开始使用“书爱家”这个独特称号，它所特指的这类群体，不但关注书籍的作者和内容，也喜爱书中的文采和思想，同时还重视书本的版本和装帧，他们对一些细节之处也津津乐道，诸如题签、插图、序跋、纸张、护封，甚至印刷的数量、次数，以及作为收藏的藏书票、毛边书、签名本等等，均是极为讲究，似乎惟有精益求精和尽善尽美，才算对得起这个优雅的称号。按“书爱家”的品味，最近有三套丛书值得一提。一套是青岛出版社的“良友书坊”策划的“大家文丛”，已经出版到了第二辑，分别有台静农的《酒旗风暖》、聂绀弩的《对镜检讨》、吴祖光的《往事随想》、王元化的《思辨历程》，都是当代文坛和学界的宿儒，文字与境界自是不凡，而这套丛书的装帧和设计也颇费心思，例如书名辑录自作者的笔墨，编排也是对作者本人很有研究的学者和编辑，又采取精装的形式，封面设计也极为简洁，颇有些大家风范；第二套丛书为北京海豚出版社出版的“海豚文存”，由梁由之主编，计有沈昌文的《八十溯往》、钟叔河的《记得青山那一边》和朱正的《序和跋》，均为布面精装，颇为精致，这三位文人都曾以编辑和出版谋生，功力深厚、思想开明，是引领风气的文章大家，更巧合的是，他们



还都出生于1931年，因此这套文丛也得一别号为“三老集”。据说9月15日京城三联书店为其中一老沈昌文先生庆祝八十寿诞，文人雅集，场面动人，又逢这册《八十溯往》面世，可谓适逢天意的书林佳话了；另一套文集则是由南京《开卷》杂志主编董宁文与原南京凤凰读书俱乐部的倡导者蔡玉洗博士所主编的“开卷书坊”，收有文集八部，计有子聪的《开卷闲话六编》、宋词的《我的歌台文坛》、张国功的《纸醉书迷》、沈津的《书林物语》、严晓星的《条畅小集》、彭国梁的《书虫日记二集》、躲斋的《劫后书忆》、琨西的《寻我旧梦》。这套丛书的作者虽不如上面所提的“大家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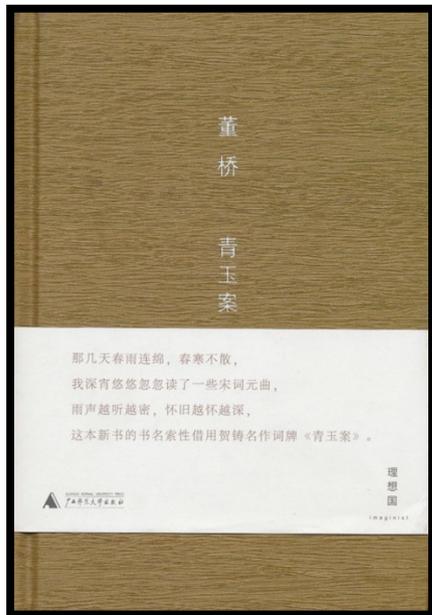
作者知名，但也多是文章好手，且还是不折不扣的“书爱家”，因此这套丛书不但内容多与爱书、读书、藏书、淘书、写书等有关，而且邀请了南京知名的“书衣坊”主人朱赢椿进行整体设计。以子聪的这册《开卷闲话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7月）为例，采用了小32开本的精装，封面极为简洁大方，又有南京知名的版画家刘春杰的版画作书籍标识，南京书法家丁大军的题签更增古色书香，另有黄裳、钱伯城、罗飞、文洁若、陈学勇、汪家明等文人与学者的序言，而内文中还有钟叔河、来新夏、姜明德、扬之水、陈四益、黄裳、周退密、董桥、陈子善、流沙河等文化名流的墨迹，如此密集与用心的策划和编排，真可谓赏心悦目。

要谈爱书人，至今健在的上海文人黄裳不能不提。黄裳不但藏书、写书，而且对于书的版本、流传以及装帧、插图都颇有研究和心得，而他的文字也很是老到，成为很多爱书人追索的对象。更难得的是，黄裳先生今年已近百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每年都有新书问世，或再版，或增订，或新版，让人大叹不已。我曾评述黄裳为“老来俏”，虽有不敬，但也算客观吧。今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知名编辑张昌华主编的四卷本“黄裳文集”，计有《秦淮旧事》、《书香琐记》、《我的书斋》、《故人闲话》，又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增订版《来燕榭书跋》一册，还有上海书店出版的《门外谈

红》一册，据说还有一册《来燕榭书信选》正在编辑中，不久也可问世。其中《来燕榭书跋》（中华书局，2011年6月）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次增订补充了近年来黄裳所写的文字，相比竟多了近一倍的篇幅，总计239篇，文中所述可能是黄裳最为动情也最为性情的部分。在这册著作的后记中，黄裳说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聚书，起先以新文学著作为主，随后不久兴趣转向线装旧书，前后持续了大约十年光阴，直到文革被全部查抄为止。文革结束后，这些旧物又陆续发还给他，但让黄裳后来颇为感慨的是，“想不到的劫后重逢，摩挲旧物，感慨无端，因摘要选取书前所存题记，别为一册。漫无次序，随得随录，倏然成册，遂付刊行，及今亦已十年矣。”黄裳的这一举动，让我想到了作家孙犁，他在晚年得到被发还的书籍，所作的一项工作便是给这些旧物包上书皮，并以极为深情和文雅的笔触，写下了不少题跋，这便是后来结集出版的《书衣文录》。它与黄裳的这册《来燕榭书跋》，以相同的方式表达了劫后心境，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诸如黄裳这样的老辈文人的文字真是读一篇少一篇，他的著作出版，我一般会买下来，或者重温，或者寻找自己未见的新作。与黄裳同为爱书人的，我以为数得上首当其冲的是香港的董桥先生。董桥的文章也是越来越老到，也越来越妩媚风流，诸如今年连续出版的文集《橄榄香》

和《清白家风》，都是新文章结集的精致本子，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青玉案》和《记得》则算不得新书了。他的著作不但文字吸引我等读书人，而且还有装帧与版式，均是当下作书的极致，想来这或许与他自己熟悉中西书籍的版本和收藏有关，也与他自己的性情与趣味有关吧。我近来读了他的《清白家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封面的齐白石国画小品清雅有致，董桥的文字依旧漂亮，内容还是谈往事、谈旧藏、谈文玩、谈雅趣。不妨提一提他这册新著中的那篇《写给刘若英的新书》，这是董桥给刘若英的新书《我的不完美》的序言，但全文却一字不提刘若英新书的书名，想来怕俗也怕败坏了笔下的文字。刘若英乃名人，也是董桥的粉丝，后来又成了朋友，自然难免这样的应酬文字，但董桥的序言，却全篇风流，因为几乎整篇文章都是在写海明威在巴黎的回忆往事，到最后也写点刘若英在香港的回忆故事，然后夸刘若英“心里透亮”，但也不忘记写到其中的不足：“读刘若英的文章我也看出了她的尝试，不必说破，说破了怕坏了她的思路。让她静静地摸索才有趣。刘小姐谦逊，尊称我为老师，我当然不配。她的才华遮都遮不住，匆促间文字里的几粒沙石来日她更成熟了不难幡然醒悟，我没有挑出来，怕她下笔多了一层负担，碍事。”董桥文采风流，也精明的可以，难怪落得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呢。



谈到爱书人，想到香港还有位少为人知的“书爱家”，他便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孙立川先生。这位孙先生曾拜厦门大学的郑朝宗先生为师，后留学东洋又投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清水茂先生门下，博士毕业后移居香港，又与定居香港的学术文化大师饶宗颐先生密切交往，成为其私淑弟子，按说有这样的学术经历和优势，应该研究学问才好，但不想这位孙先生却以在香港做出版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事业。他在一篇短文中说，自己在出版中，对于许多文化老人的著述更为关注，并戏称自己是文化出版业中的“啃老族”。我知晓他的这一趣味，缘于他首先拿到周有光的《拾贝集》书稿，率先在香港出版了这部文集的全本，在商业的香港，此举令人敬佩。近来读了他的文集《北窗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

司, 2011年5月), 便见他因为出版、编辑和学术往来, 曾与金庸、梁羽生、饶宗颐、唐振常、王世襄、周有光、王利器、贾植芳、冯其庸、蔡其矫等等诸多文化名流, 均有密切的私人交往, 这本著作便多记其与之交往的印象和侧记, 而其独特的身份和角色, 又常常能给我们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和思维, 所以他笔下的人物生动又活泼, 新鲜又别致。可以说, 有孙立川先生这样的有心人, 谈论当代中国学术文化史, 才更多了一份独特而丰富的见证和注脚。

我赞叹孙先生为“书爱家”, 不仅仅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近年来屡屡有佳构出版, 而且孙先生本人便是极为懂书之人。他的这册《北窗集》, 邀请岭南硕儒梁披云老先生题签, 又有金陵八大龚贤的《千岭万壑图》作为封面装饰图画, 内页插图又有画家沈默的《东坡岭南诗意》多幅, 而书名“北窗”则是他取自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其诗句为: “吟诗作赋北窗里, 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 有如东风射马耳。” 其实取名“北窗”, 还有一个缘故, 便是在此之前, 孙立川尚有《东篱集》、《西还集》和《南耕录》三册随笔集, 其中《东篱集》是他日本留学的游记散文, 《西

还集》是他有关鲁迅研究的随笔, 而《南耕录》则是有关版本和书籍编辑的笔记。四册文集, 东南西北今已齐全了。

孙立川先生早岁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岭南学院, 并有《鲁迅研究扶微》、《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等学术专著问世, 但随后转行从事出版和编辑工作, 倾心于学术文化著作的普及与出版, 这一转变看来似乎颇为可惜, 但我看他在《北窗集》的序言中的一段话, 似乎可以理解他这一选择的深意所在: “在汲汲追求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之时, 我们是否还会想起: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的精神追求? ‘君子喻以义, 小人喻以利’ 这类孔老夫子的话, 传了两千多年了, 是否也不合适宜了。现在在全世界各地设立了几百间‘孔子学院’, 不知道除了教汉字和拼音外, 也有介绍中国人文精神的课程否? 在一片欢呼盛世的大鼓吹和一切向钱看的热潮中, 我上文所说的中国‘最后的知识分子’ 早已被人们逐渐遗忘, 那么, 除了捍卫体制的主流知识分子与争自由、民主的体制外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 纯学术的文史哲的知识分子是否还有他们的生存空间?”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辛亥百年，媒体、学术界、出版界集体出动，热闹非常。除开“百年大庆”这类俗套原因外，如今“各家争说辛亥年”的背后，其实让人隐约感觉些许不安，因为如此的纪念方式，已经不再是某种远距离的旁观，而是源于时局所迫的当下隐喻，无论保守或激进。

就最近如潮水般上市的“辛亥”书籍而言，笔者没有精力去一一鉴别水平高下，只能略微罗列一些书名，供诸位参考：如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杨国强、罗志田等人的文集《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3月）、马勇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傅国涌编著的《百年辛亥》（东方出版社，2011年6月）以及杨天石编著的《辛亥革命的影像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等等，其他各种更为通俗的读物，则是数不胜数。

就阅读而言，如此多的选择的确让人目眩神迷。不过面对历史读物，许多人的兴趣其实往往只停留在听故事，摆立场的程度，至多最后加上自己的概括性总结，“历史无非就是这样嘛！”如果历史研究就是事实材料加上价值观随意搅拌而成的“生菜沙拉”，或许历史学家早就应该下岗离

职，另寻一份正经差事。事实上，如今的许多辛亥著作，就史料上而言基本大同小异，无甚差别，但为何同样一段历史，不光是当年的历史参与者，就连相隔百年的后来者，也会据此划分阵营，可见“历史”与当下之间，绝非泾渭分明。不过笔者一直认为，如果对那段晚清民国史有兴趣的朋友，与其让坊间各种新论、怪论迷了双眼，不如还是从一些经典的基础研究慢慢读来，因为读史，最重要的仍旧是独立的“史识”。

最近，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二版）重版了，这本书初看是在分析群众运动的策略，其实是一本深度反思人性、群众运动参与者深层心理的著作。可以这样说，这绝对不是一部讲究“政治正确”的书，他不会简单地宣讲“造反有理”，“越穷越光荣”这类道德准则，这位出身于码头工人的社会哲学家要告诉人们的，往往是一些人性的“残酷”道理，比如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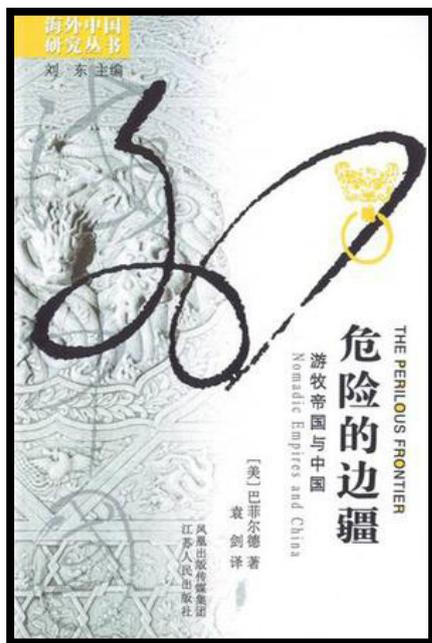
一个新兴群众运动赖以吸引和维系追随者的，不是主义与承诺，而是能不能提供人们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可以逃离焦虑、空虚和无意义的生活。它能够治疗严重的失意者，不在于提供一种绝对真理，或是解

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而在于能让他们摆脱无能的“自我”。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得是把失意者融化到一个紧密无间的集体中。

当一种群众运动的反抗理由是如此的道德正当时，当人们投身于如洪流般的集体运动时，适当地想起霍弗的话，或许不至于让自己在集体无意识中完全丧失自我，事实上，一边保持清醒，且仍不失自我的反抗，才能真正具有智慧。就如霍弗所言，“即使是本来自足的人，身处一个群众运动，也会被塑造得不完整和具有依赖性。”

群众运动的精神本质是什么？沃格林将现代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归咎于灵魂的失序，是基督教灵知主义的现代复活版，典型者如马克思主义，这些群众运动的精神领袖们都认为在此世获得无上真理，结果当然是失败。但是对于霍弗这样的思想家而言，他却认为，群众运动的这类狂热，既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却又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国家重新振兴的神奇工具。面对这样的诊断，是否也与今日中国的激进与保守思潮之争有相通之处呢？

在前几期阅读报告中，我曾略述过一些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著作，事实上，要想客观完整地理解边疆问题，依靠现有的国内出版物显然很难一窥全貌，更会想当然地认为边疆民族问题只是政治权力的博弈，从而忽视了边疆地区特有的宗教文化



特色与自我认同，如果不正视这点，势必会出现边疆问题上的“头重脚轻”，看似控制严厉，实则权威流失，此种治理模式，非但无助于政治的融合，更不利于边疆与汉地的文化交流。当然，了解边疆问题，或许还是得从历史入手，这里推荐的是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我一直相信，如果对历史有充足的了解，虽不足以保证我们未卜先知，却足以让我们少犯一些愚蠢的错误。

这几年，笔者一直在留意国内古典音乐史方面的研究，不过很遗憾，我基本上没有发现哪所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开设过音乐史或思想史的课程，这不仅反映出国内虽有音乐演奏和研究，却无音乐史研究的现状。那么有人或许会问，接受古典音乐，为

何需要音乐史和音乐的观念史? 简略回答, 西方古典音乐的兴起与演化, 绝非是音乐本身平地而起, 如莲花不着水般独立, 而是与整个西方文明与思想的演变密切相关, 假如一个音乐家不真正体验到这些文明与观念的细微之处, 很难让人相信其演奏足以服人。最近有一本著作让笔者眼前一亮, 即迪迪埃·法兰克福的《**音乐像座巴别塔——1870—1914年间欧洲的音乐与文化**》(郭昌京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此书的精彩之处甚多, 不足以一一征引, 但对于笔者而言,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

让我们有能力远离那种“音乐就是普世性的, 去政治的”纯洁化论述, 而是认为19世纪到20世纪这段历史中, 民族主义与古典音乐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虽然音乐上的民族主义不足以发展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但显而易见的是, 在19世纪末期, 瓦格纳是民粹主义们反对自由主义的艺术武器, 在这个谱系当中, 我们还可以寻找到布鲁克纳, 至于希特勒与瓦格纳之间的精神联系, 更是思想史早已争论不休的话题。或许, 与其让音乐告别政治, 还不如抛弃超然世外的幻想, 让音乐能真正面对政治。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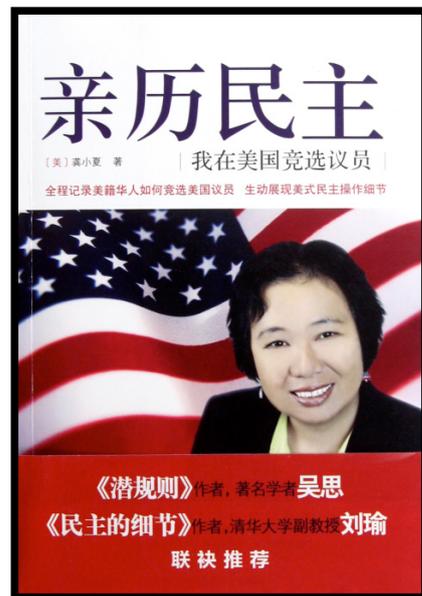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2012是很多国家的“选举年”。即使一些宣称“民选将导致动乱”的国家，也欲拒还迎，精心排练仅供观赏的选举哑剧，营造主权在民的形象工程。既然如此，需要讨论的就不是“民选是否必要”，而是“民选如何展开”。遗憾的是，在讨论过程中，民主的价值常被提及，选举的细节却被忽略：民主作为一种理念，能够唤起道德激情；选举的技术和程序琐碎而且世俗，经常导致政治冷漠。但是，如果不在选举的细节上仔细推敲，民主的价值很难得到展现，甚至会适得其反。

龚小夏的《亲历民主：我在美国竞选议员》（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与几年前老摇的《美国草根政治日记》（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有殊途同归之处，作者都是通过亲身经历讲解选战流程，通过选举的细节介绍民主的价值。移民美国的华人数不胜数，但获得公民身份并不等于养成公民意识。从移民转型为公民，“选民”是重要中介，积极公民不仅参与选举，也参与竞选。（当然，以竞选以外的其他方式参与公共事务，也是积极公民。）积极公民不同于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以融入集体为己任，积极公民则是兼具独立和协作精神的个体。

从参加培训到筹建竞选班底到筹款



到动员到投票环节，龚小夏在书中讲述了她竞选弗吉尼亚州议员的过程，事无巨细、不厌其烦。以参加培训为例，共和党为各级候选人举办了为期五天的培训班，在这个龚小夏称作“党校”的地方，不是白天睡觉、夜夜笙歌，而是披星戴月的魔鬼式训练，培训结束第二天她就发起了高烧。共和党人的25本政治必读书单更是包括《埃德蒙·伯克文章与演讲选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等。作为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的龚小夏感慨：

“这五天里的收获，比在哈佛上一个学期的课还要多。”

龚小夏深知选举问题重重，比如党团会议存在重复投票、划分选区两党以邻为壑，但她没有以完美的民主乌托邦为标准，否定并不完美的民主实践。民主与乌托邦本身就是互相冲突的，在书的结尾，龚小夏强调：“民主制度正是人类发明的制衡自身追求完美的冲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人的有限性决定了民主的不完美，最有知的人认为自己是无知的，最接近理想的民主承认自身是不理想的。对民主而言，完美的同义词是虚假。有时，完美的同义词是封闭。只有在封闭社会，完美触手可及，幸福无处不在。河南洛阳一名男子开挖地窖，将6名歌厅女子囚禁为性奴。他“调教有方”，女孩子们不仅毫无反抗之意，反而相互妒忌，常常以“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发生争执。（9月22日《南方都市报》）地窖不过是封闭国家的缩影，当地窖放大到成千上万倍，大哥就会被称作“领袖”，地窖则被称作“共和国”。

乔治·索罗斯被视为金融大鳄，可是他的终极兴趣绝非经济，而是致力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他颇有些怀才不遇地自况：“我被人们广泛但有些夸张地称为金融界的宗师。但是，我关于政治和安全的观点却很少被人们认识。”生于俄罗斯的安·兰德，后来移民美国，她深知利己主义之恶，一生致力于为利己主义恢复名誉。生于匈牙利的乔治·索罗斯，对故国遭受封闭社会之苦也是感同身受。他的父亲

迪瓦达·索罗斯在回忆录《假面舞会》（宋嘉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9月）里回忆了那段历史，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人们容忍他人所遭受痛苦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但是他本人却拒绝实践这句话，而是尽可能地减少那种痛苦。乔治·索罗斯传承了这种家学。

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十年后出版该书修订版。乔治·索罗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极权主义都有批评，这有点像在中国，与铅笔社和乌有之乡同时保持距离。市场原教旨主义寄望于万能的市场，极权主义寄望于万能的权力。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学者曾希望自由市场对垄断权力构成挑战，但是此后发现市场和地窖度过长达十年的蜜月，并且发展成为一种“市场-地窖”模式，还将继续甜蜜下去。

乔治·索罗斯创办了开放社会基金会，致力于推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开放社会。他深受波普的影响，拒绝稳定、和谐和幸福的“市场-地窖”模式，指出：“开放社会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对世界认识的天生不完备性。”由于语境不同，乔治·索罗斯的批判对象也有侧重。他专门在“致中国读者”中强调，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所以着重分析了市场经济的缺点，如果一开始就打算写给中国读者，会写成“一本赞美市场经济优越性的书——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长期以来无法为中国人民所享受”。

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世界公民是美国政治思想学者吉恩·夏普，他是非暴力运动的精神教父，1983年创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致力于以非暴力的方式推动民主转型。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封闭社会，从苏联到“阿拉伯之春”，他的理论都赋予公民以反抗的灵感。吉恩·夏普的著作可以在研究所网站下载：<http://www.aeinstein.org/>。即将颁布的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能授予索罗斯或夏普，将是名至实归。

上期“独立阅读”讲到《燃灯者》（赵越胜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在内地出版。与港版相比，这个版本有些删节和调整。但是，我对内地版《燃灯者》的态度和对《巨流河》（齐邦媛 著，三联书店，2010年10月）一样：原版自然是首选，如果一时找不到原版，也不妨先读内地版。即使删节之后，这两本书依然让人读得荡气回肠、辗转反侧。但如果是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一定要认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版本，而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两个版本几乎是两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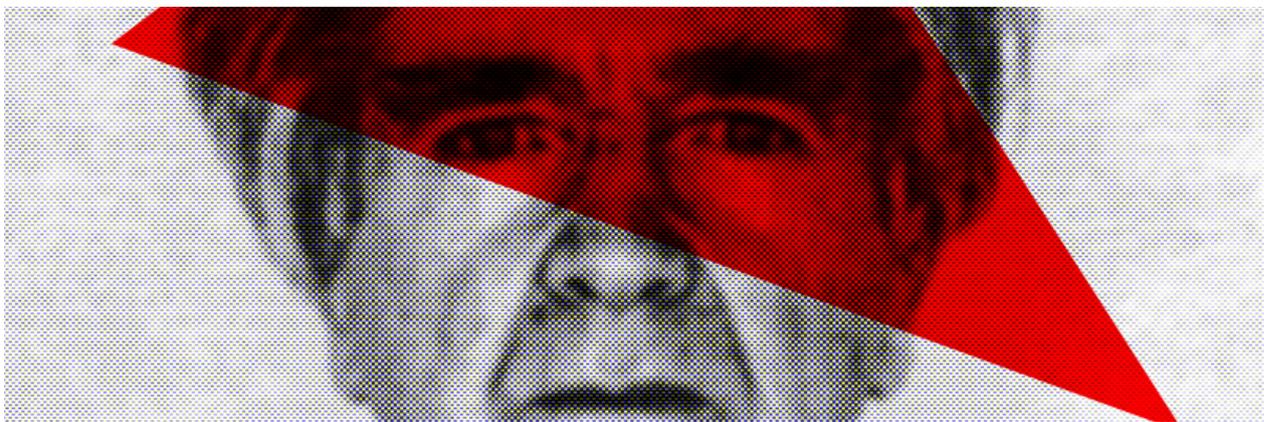
《燃灯者》反复提及拉波埃西的《自

愿奴役论》，这篇文章曾经摘要发表于《法国研究》1987年第1期。崔卫平在微博上做了摘抄，其中这段尤为难忘：总是有一定数目的人，具有更多的自然禀赋。他们感觉到桎梏的束缚，希望扔掉它。他们任何时候也不能习惯于受奴役。这些人，象思念故乡炉灶上的炊烟一样，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自己的自然权利。他们具有清晰的认识和明达的智慧，希望知道前前后后更远一些的事物。

是的，只有像思念炊烟一样思念自己的自然权利，才有可能走出地窖。🔴



齐奥朗：活在火焰之中



特约撰稿人 凌越（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孤独总是如此耀眼，这让隐士们万分沮丧。有时候越是孤独，相应地窥探的灯泡的功率就越是强大；世间的悖论比比皆是，这只是其中表面的例证之一。齐奥朗深谙孤独之道，这位罗马尼亚裔法国作家在笔记中写得明白：“我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这是我唯一的目标。重返隐居生活！让我为自己创造一种孤独，让我用尚存的抱负和高傲在心灵中建起一座修道院吧！”他的著作预示着这心灵修道院的落成，可是他哪里知道现在这修道院已经成了旅游胜地，好奇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为这建筑的阴森和幽暗所吸引，全然不顾建造者从角落里投来的厌恶目光。还好，齐奥朗已经长眠于绝对的孤独之境——死亡，他的著作掀起的世俗波澜不再可能惊扰到他，否则那犀利的唇舌间又将吐露何等可怕的诅咒，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诅咒只会引来更多“游

客”，因为人需要诅咒不可替代的解毒作用，正如他们对轻浮赞美的享用。

孤独奇特的聚焦作用，早在齐奥朗预料之中，可是世俗声誉在其中的聚焦并不在齐奥朗的关注之列，——那样未免小瞧了他，对于世俗荣誉他有一种真诚的惶恐——，顶多他桀骜不驯的眼光在其上不经意地掠过，最终这眼光将落在被孤独聚焦的激情之上。齐奥朗深知所有激烈的东西都同时拥有一个天堂和一个地狱，而这才是他情之所系。天堂由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显得飘渺、不真实，如此通向天堂唯一可靠的途径就是跳下地狱，它的灼伤也就是天堂的狂喜。面对来自上天的召唤，齐奥朗最经典的姿势却是静默，他的“无从应对”将自己抛掷到他所眷恋的字词中，他因而得救？至少，他还来得及写下那些充满魅力的诅咒：对于圣洁的泪水的唾弃，对于繁衍疯狂的先知的讥笑（“高贵只有一种，就在对存在

图为齐奥朗

的否定中，在俯瞰断壁残垣时，那一抹微笑里。”），因而灵魂强加于精神的任务被一笔勾销。他仍然处在悬垂状态，立于天地之间，思想所携带的词语之河川流不息，以免赞美所带来的自足的幻觉被釜底抽薪。生命，什么也不需要证明；文字在自身的神秘中仅仅是模模糊糊地抓住了它。永葆存在的激情——齐奥朗所有著作指向这一行字。

这样的孤独带来茫然的自省，“大地、天空，是你修炼间的四壁，而在没有任何生气拂动的空气中，唯有预言的缺席占据着一切。”往内心深处挖掘的孤独离时代越来越远，齐奥朗和他所推崇的克尔凯郭尔、尼采一样，一心只从自我的深处去汲取思想，陷溺在他们的缺陷所修饰的永恒里，而他们的战栗和热量倒有可能给平庸的时代带来创造自身传奇的可能。这种毅然地向内挖掘如此艰难，齐奥朗著作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格外滞重，让人忍不住要充满仁义地为他划上句号，可是晃晃悠悠，这些句子仍然在倔强地向前发展着，带着人们前往不曾见过的墨汁般的黑夜。桑塔格在《“自省”：反思齐奥朗》一文中，也不忘指出：“齐奥朗写作的特色是，他用以开头的正是别人用以结尾的。由结论开始，他就是从这里开始写。”这是外在的观察，其实这正是由齐奥朗持续地向内心掘进的写作方式所决定的。尽头的尽头永远是黑暗，但也还有温暖的热度，这是上天给予倔强者独特的奖励？而对齐奥朗最起码的尊重就是在有关他的任何结论后面，你得加上一个

问号，如此你才敢于迎接他恶毒的布满血丝的眼神，何况他的文字下还埋藏着尖刀。

在《解体概要》一书中就三次提及这件“凶器”，在《狂热之谱系》中，齐奥朗写道：“人一旦拒绝承认思想观念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就会发生流血……坚定的决心下面竖着一把尖刀；满怀激情的眼睛预示着凶杀。”在《恶人的模样》中，他又写道：“他额顶匕首，遐思满腔，而又好像是在动手之前，就已经对一切罪行感到失望。”在书的末尾《箴言家的秘密中》一文中，他又提及：“欢乐给人以致命的打击……欣喜在微笑之下掩藏一把匕首。”无论是决心还是微笑，在齐奥朗的眼里，其后都隐藏着尖刀。不是因为这决心和微笑有多狡诈，而是这尖刀原本就隐藏在齐奥朗的视线之中——在齐奥朗的著作中，这尖刀其实无所不在。他习惯于用它在世俗的观念上划一道口子，然后贪婪地盯着从伤口里慢慢往外渗透的鲜血；齐奥朗正是用思想的暴力赋予思想和观念本身以新意，或者还怀有对他讥讽过的“深刻”隐隐的期待。对此，齐奥朗在《缩短的自白》一文中作过正面表述：“我只愿在爆发性状态中，在狂热或高度紧张中，在一种清算气氛，一种痛斥取代打击和伤害的气氛中写作。”疯狂、热烈、恶心、深渊、憎恨、恐惧、厌恶、癫痫、腐烂、魔障等等重量级词语充斥齐奥朗著作中，从中我们可以依稀勘探出这是怎样一个灵魂，波德莱尔曾经说过：“要看透一个诗人的灵魂，就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搜寻那

些最常见的词，这样的词会透露出是什么让他心驰神往。”虽然这些词语被一条优雅的思维逻辑链条捆束在一起，因而减轻了负重，但毕竟是它们构筑了齐奥朗著作的底座，借用齐奥朗自己的话说：那是仇恨的历程，其用意竟然是捍卫腐败？这个沉迷于恐怖之词的灵魂，习惯于观察和表象正好相悖的“真相”：“‘真相’只有在精神忘掉了建设狂谵，不知不觉滑过了道德、理想与信仰的瓦解阶段时，才会显现。”如此“捍卫腐败”其实意在对所有“正义”之词的质疑，只有那些分崩离析的时代，才有幸向我们裸呈生命的本质。

综观齐奥朗著作，他的行文有着一流诗人的语感和讲究，颇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因而引来诗人们的赞许也就顺理成章了，196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就曾说齐奥朗“是瓦雷里之后，最伟大的法文作家之一，足令法文增辉”。对于这样的赞誉，齐奥朗一定会欣然受之，尽管在我看来瓦雷里是更优雅和绵密的思想者。瓦雷里和齐奥朗都专注于内心的省察，不过仅就自省的精微程度，瓦雷里显然更胜一筹，思维之翼的每一丝颤动都逃不过瓦雷里笔尖的追逐，齐奥朗则在思之力度上做文章，他是拿着一把匕首在做刺绣的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偶尔不小心弄得鲜血淋漓也就可以理解了。而诅咒似乎就是他的一种方式，看看这位曾经的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系学生对哲学的咒语吧：“我背弃哲学，是在发现康德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种人性的弱点，听不出一丝真正的哀伤以

后。”“哲学工作没有生命力。”“我反对哲学，所以痛恨一切无动于衷的思想。”他甚至在《哲学与卖淫》一文中，以他特有的恶狠狠的语气将哲学家贩卖自己的思想比作妓女们贩卖自己的身体。与此相应，齐奥朗毫不迟疑地站在诗歌一边：

“思想可曾写出过一页东西，达到过约伯的哀鸣、麦克白的恐惧或一曲和声的高度？”在《知识的布景》一文中，他说得更加明了：“哲学并不会比诗歌更严谨。”这些认识使齐奥朗对所有体系化的思想持一种否定态度，是啊，谁能在漫长的庞大哲学体系建设中保持足够的激情呢？他甚至不放过那些哲学体系的基石——哲学概念，他把这些概念放置在他带有锋利刀刃的思维之轴上来回切割，直到它们溃散成“一片温柔散淡、厌倦知识的麻醉液体”。

这也解释了齐奥朗何以喜欢采用片段式写作方式。体系对应着空洞的超验性，一个体系的建构本身如果没有谎言的参与将是难以想象的，那么碎片则意味着谎言的反面——一种真实的可能。同时，将激情挤压进正匆忙奔向句号的句子里，显然意味着巨大爆发力的形成，其中每个文字似乎都携带着两个大气压，它们跃跃欲试等待着爆炸。想想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的演讲吧，从语气高亢到声嘶力竭，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换言之，和庞大的哲学体系相比，片段更能保存齐奥朗极为珍视的存在之激情。片段式写作其实早有自己的传统，帕斯卡、拉罗什福科，以及齐奥朗喜欢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尼采、

维特根斯坦等都曾以片段式札记来记录自己瞬间飞逝的思想。这些学者构成了一种新的哲学：个人化的、警句格言式的、抒情性的、反体系化的哲学，他们正是踩着业已崩溃的哲学体系的瓦砾走过来的。自然，以尼采为代表的这批哲学家是齐奥朗的来源，他们对哲学和信仰的鄙夷，他们恶狠狠的极端的语气都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桑塔格甚至说：“尼采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写下了齐奥朗几乎所有的观点。”桑塔格并没有就此抨击齐奥朗的“重复”，而是对他“论述更厚重，推敲更精确，修辞更丰富”的表述予以褒扬。

在我看来，齐奥朗之所以在阐述那些猛烈然而并不新鲜的观点时仍旧独具魅力，是因为他对于现代诗歌的借重。片段式写作不仅仅是哲学家的专利，像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直至20世纪的瓦雷里、夏尔等都是片段式写作的行家里手，有时候这些诗人笔下的片段被便利地命名为散文诗。而这也是齐奥朗另一个来源。齐奥朗著作中对于诗歌的直率赞美不在少数，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行文风格离诗歌的方式更为接近；这突出表现在齐奥朗文章里逻辑链条的松散，词因为愈加处于孤悬状态，它们疯长的触手胡乱捕捉着漂浮在空中的偶然的意义。最终，这些朦胧的句子使意义在摇摆不定中得到增值。对于来自诗人的致命的影响，齐奥朗自己有着诗意的表述：“在跟他（指真正的诗人）交往中，在长期生活在他的作品深处之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会发生变化；与其说是我的爱好或

是品味，倒不如说是我的血液本身，就仿佛有某种微妙的病症潜入其中，改变了流程、浓度、质量。”这位诗人是谁呢？

“雪莱、波德莱尔、里尔克”，他们“在我们身体最深刻的地方起作用，我们会像吸纳一种恶习一样，把他们吸纳进我们自己”。在齐奥朗晚年出版的《笔记选》中，他以奇特的冷漠的方式又再次表达了对波德莱尔的敬意：“波德莱尔……我已经许多年没读他了，他并不是我常常想到的人。”在笔记本上郑重其事地记下对一个诗人的忽视，没有比这更高级的赞美了。其中隐含的反讽正是波德莱尔的拿手好戏，我们可以就此恭喜齐奥朗——他可以出师了。

读齐奥朗的文章，我常有恍惚间来到波德莱尔作品后台的感觉，齐奥朗作品中许多疯狂的段落像是出自波德莱尔所描述的那些怪诞人物之口。那个吓走了漂亮小孩的老妇人，那个向驴子致敬的讨好者，身背巨兽没入天际的旅者，以老鼠为玩物的穷孩子等等，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中致力于对这些怪人的外部描摹，而齐奥朗则好像是在试图让这些人直接开口说话，如果说波德莱尔还以场景为外衣让这些人依附其中，齐奥朗的文章则完全是赤裸裸关于恶的诉说——甚至称不上是控诉。对于视觉场景描述的弃绝，早就是齐奥朗的自觉行为，在1937年出版的《眼泪与圣徒》一书中，齐奥朗对自己完全转向自省有过辩护：“眼睛的视野有限：它总是从外部观看。然而一旦将世界纳入心中，内省就会是惟一的认知模式。

心的视觉空间=上帝+世界+虚无。那就是——一切。”当然诗人们对此未必认同，像波德莱尔、兰波等诗人习惯于从外部场景的描述入手，并不是他们浅薄或者受到视野的蒙蔽，而是他们对于卡尔·克劳斯的名言——“越是表面的越是深刻”——心领神会。不管怎么说，齐奥朗的决绝毕竟帮助了他，他的固执将他的自省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推进到思想的尽头，在那里在完全的自我意识中，人们倒是有可能重新获得恩典与纯真。

因为完全脱去了场景和叙述的外衣，齐奥朗的文章一开始就将自己的言辞置于白热化的思辨之中，一种赤裸裸的高烧。状态好的时候，格言与警句如集束炸弹般被掷出，但是它同样没有场景和叙述作为缓冲地带，思维偶尔的短路也将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波德莱尔在场景里横向的铺排，其实也可视作迂回着向内。波德莱尔的眼睛和大脑在协同工作，它们相互配合从容而优雅地走入深渊，而齐奥朗则像一个盲人深陷在大脑沟回的迷宫里，逻辑之链向内的疾进是其关注焦点，说到底齐奥朗关注的是思想的纯粹性，是关于思想的思想，“惟一自由的精神与存在和客体完全无关，只不断增加其自身的空虚。”在这里，齐奥朗达到了诺瓦利斯曾经到达的高度，早在1799年诺瓦利斯就曾得出过颇富前瞻性的观点：“人们所犯的荒谬而令人惊讶的错误是相信他们使用的语言与事物相关。他们没有意识到语言的本性——语言惟一关注的只有自身，这使得它成为



图为波德莱尔

一个如此丰富奇妙的谜。当一个人仅仅为了说话而说话时，他所说的正是最新颖、最真实的事物。”既然语言的现实地基只是一种幻觉，既然“在每一种说法下都躺着一具尸体”，精神轻狂而放荡的舞蹈将结结实实地扎根于虚空之中。至少，齐奥朗就是这么看的，他的词句就是精神的狂舞，既虚幻又迷人，而意义不过是他的词句偶然捕捉到又随即放弃的玩物，而所谓的“真”则恰恰存在于词语癫狂的状态之中，它从来不会乖乖地稳稳地自动投身到你的脑海之中，为了这逝去中的攫取你必须狂舞必须撕咬。齐奥朗的句子调子太过高昂密度太大，让人目不暇接但也容易引发倦怠，对于平庸的内在恐惧催生着思维的加速度，隆隆的思维机械之声中升起了在寂静中空转的轮盘，诡异的景象一直在暗中伴随，挤压着考验着文字的韧性。当我们从齐奥朗充满魔力的语言中醒悟过来，我们几乎真的要相信他坦率的自白：“我毫无哲学天分……”

对于像齐奥朗这样“专心投身于摧毁自我的人”，自省就是一把利斧，让人稍感意外的是，在被劈开的自我的内部却是镇定而麻木的语词世界，如同宇宙深处模糊的星云掩饰着黑洞。内心撕裂的“吱吱咯咯”的声音势必会传递到一一对应的词语，这也是为什么出色的现代诗人和学者迷恋“矛盾修辞”这一古老技法的原因。所谓矛盾修辞是指将两种性质完全对立的词语强行扭结在一起的修辞方式，比如“肮脏的伟大”、“迷人的战栗”等。一般来说，两股相反的力有益于

思维空间的拓展，而且可以便捷地躲避习见固执的侵袭。

这种使用词语的方式因为波德莱尔的大量运用而引人注目，而它也是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反对者德·迈斯特修辞的中心方法，他们二人对于齐奥朗文风的影响显而易见，别忘了1957年齐奥朗曾经应邀编选了一本德·迈斯特的文集，并撰写了一篇长序。翻开《解体概要》，矛盾修辞比比皆是：“虔诚的时代最为擅长血腥的壮举。”“希望如同一场灾难。”“忧郁滋养于腐蚀它的一切，在它优美的名字之下。”南辕北辙的两个词拽拉着意义的绳索，静默之魔力由此而生，多少人在真空的抚慰下溃不成军，而貌似柔弱的美则被倔强生育下来。在《二元对立》一文中，齐奥朗写道：“我们能够一边忍受生命的恶痛，一边摒弃着生命，一边任自己被涌出的欲望所左右，又一边排斥着欲望。”生命的徘徊演绎为词语之美，这多少有点让人失望，可反过来，被词语之手触摸过的生命黑洞则别有一番景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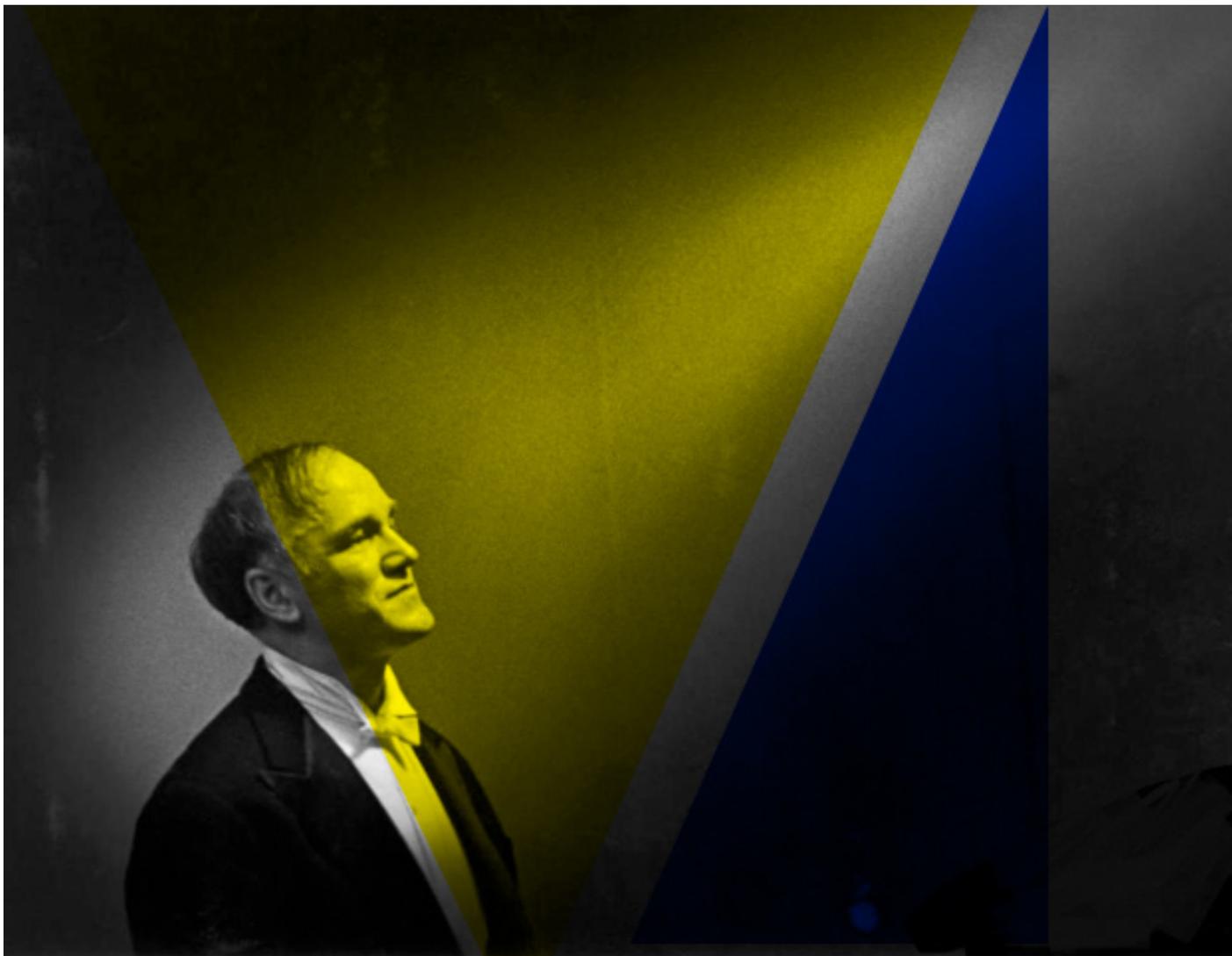
在各种对立关系中，没有比善和恶的对立更惨烈的了。那是真正的黑洞，疯狂吞噬着肉体、道德、言辞乃至万物。充斥于《解体概要》中的蛆虫、被活剥的人、棺材、腐骨等词语使它便捷地获得了恶之表征，可如果不是通过“对立面”，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进展。“没有什么智慧是不带死神的阴影”，想想鸟儿为了高飞不断向下拍打的翅膀吧，人也只有踩着恶的尸身向上攀登。英国诗人布莱克就曾说过：“像毛虫选择最美丽的

树叶产卵一样，传教士把他的诅咒倾斜给最甜蜜的快乐。”是啊，有谁可以否认在读那些瘆人的词句时，感官所获得的病态的快乐？

禁忌圈养着意义的处女地，那里水草丰美却少有人迹——恶在守护着它。而突破禁忌则意味着摆脱庸常之美的束缚，内心撕裂的刺耳之声则一扫美的单调，最勇敢的学者和诗人都在觊觎那片不毛之地的壮美，波德莱尔、兰波、洛特雷阿蒙、克尔凯郭尔、尼采等等早已是新世界的探险者，齐奥朗则是这一耀眼队

列中的一名新丁，“所有神话其实都沾满了我们的鲜血，而文学也一直在我们身上培养着对效果的嗜好”。如果说波德莱尔运用贫穷、堕落、邪恶之物锻造崭新的诗篇，齐奥朗则希望用同样的物件锻造崭新的思想。习见是如此顽强和固执，它将最具野心的作家逼入荒野逼入禁忌之地，在那里收获的宝藏的确是血淋淋的，但作为一名“现代”作家，你再也不可能直接越过粗糙的贝壳抓住圆润的珍珠。

向恶的真理敞开怀抱，齐奥朗深知其中的危险和魅力，齐奥朗为此设置的



图为齐奥朗

安全阀是与“行动这个万恶之母”隔绝，恶因而不再与自然秩序直接对立，而是属于意识的范畴，相反“宽容和鄙夷所具备的那份漠然，却能使时间变得非常舒适地空洞”。齐奥朗进一步从反面加以论述：“一切道德对善良都构成威胁，唯有漫不经心能拯救它。”齐奥朗书写了多少恶狠狠的字句，书写过多少让人恶心的事物，可是说到底你仍然会对他感觉亲近，你并不真的觉得这位作者就是一个“恶人”，因为“人们所犯的荒谬而令人惊讶的错误是相信他们使用的语言与事物相关”——在此我们需要再次引用诺瓦利斯的这句名言。正途已经被伪善彻底阻断，而恶之小径倒出人意外地生机勃勃。在人类生活中，惟有卑贱的部分能获得最丰富的意义，而诅咒也就是最实际的走向祝福的途径。齐奥朗仍然在用自己近乎耸人听闻的言行践行着那句永恒的名言：“向下的路就是向上的路。”

在一种将忧伤稟赋推进到邪恶境地的孤独中，齐奥朗有条不紊地出版着自己的著作，其默默无闻的“反响”倒是暗合了他关于绝响的幻想。在1937年移居巴黎之前，齐奥朗出版了罗马尼亚文的《在绝望之巅》、《欺瞒之书》、《罗马尼亚的变革》、《眼泪与圣徒》等著作，这些著作一开始就奠定了贯穿齐奥朗整个创作生涯的激昂狂热的文风，其中透露出的反犹情绪更是让日后定居法国的齐奥朗自己都震惊莫名。1946年起，齐奥朗决定用法语写作，写作语言的转变其实暗示着和自己母语的决裂，而一个新人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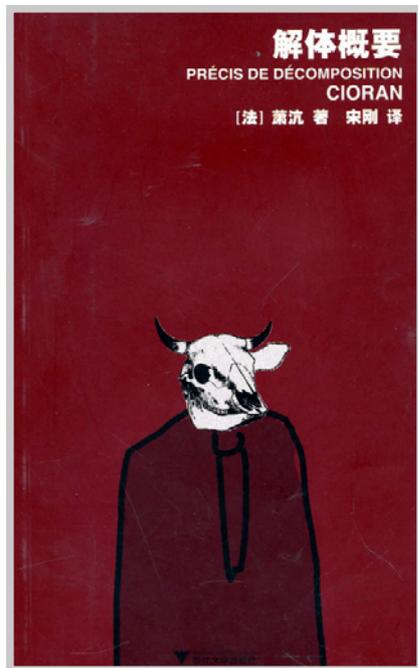
夹里仍旧夹带着过去的火药。随后，齐奥朗陆续出版了《解体概要》、《苦涩三段论》、《存在之诱惑》、《历史与乌托邦》、《坠入时间》、《恶质造物主》、《供词与诅咒》等著作。齐奥朗支离破碎的叙述方式为他在文学圈赢得好评，但是在图书市场他的书一直出于寂静的边缘，而这显然有助于齐奥朗常年保持着怒视群氓的基本姿态。

1986年，齐奥朗以《赞赏练习》之名出版了自1957年以来陆续撰写的一系列人物肖像，以随笔形式分析了瓦雷里、贝克特、圣-琼·佩斯、菲茨杰拉德、米肖等一众文学名家。这些文章由于要迁就对于人物的描摹，齐奥朗不得不拧紧了逻辑链条，收束了想象空间，其跃向天堂或地狱的持久不息的冲动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一种被简化的意义则水落石出。并不让人意外的是，这本书成为齐奥朗生前最畅销的书，他也凭借此书而声名鹊起。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倒也没有脱离齐奥朗斜睨世界的眼神，正如他在哀叹博尔赫斯的盛名时所言：“功成名就是最惨烈的刑罚。”苦思冥想的印记在《赞赏练习》一书中显著弱化了，想必齐奥朗也写得更为轻松愉悦——他不用再紧盯着泛着恶臭的地狱之河，也不用观察“被活剥的人瞳孔中闪烁的罪恶”。在这里，对于米肖、贝克特等友人充满人情味的描写取代了对人世的诅咒，而这些原本就可以轻易唤起世人浅薄的好奇心。

诗人米肖、小说家贝克特和齐奥朗确实是同道中人，人以群分，这三个人成

为朋友再正常不过。他和米肖一起看电影，他和贝克特等友人共进晚餐；世俗场景和他们在精神世界的猛烈形成对照，自有一种奇特的魅力。米肖一个流传甚广的轶闻是，在每一周必须要确保有一整天不接电话不和人说话甚至不自言自语——一个向静默致敬的一天。这就像是齐奥朗的主意，而贝克特其人其文之冷峻早就名闻遐迩，他的小说和戏剧里充斥着浅白的对话，可是他有妙招让这些大白话在上下文关系中忽然发出异彩，甚至比齐奥朗那些处心积虑的字句更加耀眼。“他的作品不止一页在我看来就像某个宇宙时代结束之后的一种独白……仿佛进入一个死后的宇宙，某些从万事万物，甚至从他自己的诅咒中释放出来的精灵梦见的地形。”——齐奥朗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米肖和贝克特是风格迥异的作家，但是在优雅隐忍的外表下都隐藏着猛烈的激情，语言的激情又从另一面禁锢了行动，正是这复杂的体验引起齐奥朗的共鸣，他对米肖的一段评价也因而完全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米肖通过他的内心的狂飙和出击的欲望，而加入到神秘主义行列，他想攻击那些不可想象的东西，迫使其开启大门，然后永不停歇，在任何危险面前永不退却地追寻下去。由于他既没有在绝对之中启航的运气，也没有不幸，他制造了自己的万丈深渊，然后一头扎下去并描绘它们。”深渊对于齐奥朗亦如同



《解体概要》

(法) 萧沅 著，宋刚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

冠冕，他的著作总体而言就像是一个掉入深渊的人的嘶喊，你甚至分不清那到底是恐惧还是惊喜。早在1937年，齐奥朗就在《眼泪与圣徒》一书中戏谑的口吻写道：“圣徒活在火焰之中，智者活在火焰之旁。”他一贯以近乎狂热信徒的语气反对着狂热，以一种极端反对着另一种极端。矛盾修辞贯穿始终，内心的撕扯呼唤着诗意和沉沦。悖论无处不在，齐奥朗则在悖论的罅隙中呈现出真诚的智者的面容，其下则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齐奥朗正是烈火中的智者，火焰同时赋予他热烈和虚无，文字却因此而长存。Q

在滨河街的日子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pessoa1935@gmail.com）

去旧书店的乐趣在于，一，你可能会遇上传说中的某个人物；二，发掘一个，归之于你最喜爱的人物当中。七八年前，我曾经因为不认识而“放过”了香港小说家董焕章，却发现了苏联小说家尤·特里丰诺夫——同在广州美院对面东晓南路一家昏暗的旧书店，当时看到一本书脊上有种圆点的书，很费劲的抽出来一看，米白色封面上印着书名和作者，右上括号里五个小字“供内部参考”，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即所谓皮书是也。好小说都很霸道，不管你是否听过作者的名字，只要你读它的第一句话就不会扔下它。

《滨河街公寓》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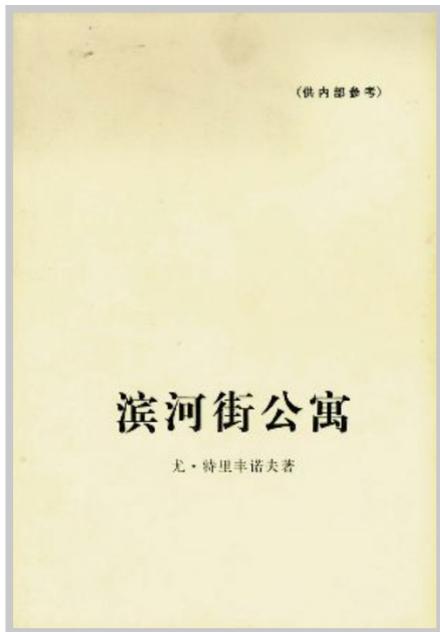
如今这样的男孩子们在人世间是找不到的了。他们有的阵亡，有的病故，还有些去向不明。有的虽然活着，也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凭借某种魔法，让这

另外一个人同已经消失的那个身穿绒布衬衫、脚踏帆布球鞋的孩子相遇，我真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好了。恐怕他连想也不会想到这是遇见了自己。嗨，由他们去吧，猜不出来算了！他们哪儿有时间啊。他们划动双手，随波流去，飞速向前，向前，向前，快些更快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两岸的景色不断变换，群山向后退去，森林日渐稀疏，天空愈益阴沉，寒气渐渐袭来。向前赶啊，赶啊——没有力气再回顾留在身后的象天边一朵残云似的凝固了的一切。

这一段的可口程度让人立刻在自己的阅读历史上为它找到合适的所在。“他们划动双手，随波流去，飞速向前……”与“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何其相似。并非只是语气、语句结构相识，读

完《滨河街公寓》，你就会发现，特里丰诺夫和菲茨杰拉德描绘的这样一个充满特色的年代，这些特色并非只属于一个特定的氛围，在粗粝的现实生活面前，也许文学的能量过于微弱，然而它所放射出来的魅力则穿行于任何时代，在东晓南路那个昏暗的书店里，正是这样一个开头点亮了我。就这样，我买下了这本只有191页的小说。

美利坚的1920年代命名为爵士时代，苏联的1930、1940、1950年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强烈特点、毫不含糊的大时代——斯大林的时代，大人物被不断消灭，小人物战战兢兢，没有尊严与秩序可言，人人面临恐惧，这是我们在关于这段时期的书里很容易获取的信息，而政治高压下必然养成的整个社会自私贪婪又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风气却是属于日常生活的一面，《滨河街公寓》正是对这种人情世故的书写。格列勃夫，这个被同伴们称为“圆面包”的家伙，斯大林时代的卑微人物，生长于高级公寓——滨河街公寓旁边的贫困区，而他的同学住在滨河街公寓，他的女朋友住在滨河街公寓，他后来的导师住在滨河街公寓，此时此景，埋下了他要当大人物的伏笔，“这种可以称之为气不忿的痛苦，由来已久”。于是，格列勃夫一步步地望上爬，上大学，进入权力层，混成了学术界的权威，这也是他从观望滨河街公寓、进入滨河街公寓、最后抛弃滨河街公寓的过程——表面上看，是他与恋人、导师之间的决裂，但深层原因还是得归结到政治斗争，是一个斗争谁，



《滨河街公寓》
(俄)特里丰诺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打倒谁的问题。和野心勃勃的反面人物不同，尤其是与我们在往常小说（特别是苏联小说）中读到的简单、平面的人物不同，格列勃夫并不是特别明显的好人或者坏人，他甚至没有特别强烈的爱憎，他的特点是不表态，在学院斗争他的导师是小说的高潮，而最精彩的莫过于格列勃夫的表现了，他深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自己不过是一颗完全没有主宰力的棋子：

好象童话里讲的那样，人站在岔路口：往前走会丢掉脑袋，往左走会丢掉马匹，往右走也是死路一条……格列勃夫却是个特等勇士，他将在岔路口徘徊到最后，呆到最后一刻，直至筋疲力尽，晕倒在地。这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勇士，一个拉

橡皮筋的勇士。他自己不作任何决定，而任马驰骋。这是一种什么性格？是懒得动脑筋么？是侥幸心理，还是在生活面前不知所措？……

特里丰诺夫所写的斯大林时代的卑微人物是这么个样子，很显然这与我们耳熟能详的苏联文学里获取的人物形象是不一样的。特里丰诺夫生于1925年，青年时代都消耗其中，在格列勃夫这个人身上其实寄托深沉，厌弃他、痛恨他、批判他，但也怜悯他。对于读者来讲，则是：当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过去了，呈现在文学领域的将会是文学的归文学，依附于文学的东西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大量翻译出版的是因政治而出名的（除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小说，在旧书店会遇到无数“工业小说”、“农业小说”，旧书店正是垃圾堆），真正反映现实、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不少是像《滨河街公寓》这样的“内部参考”。

特里丰诺夫的不少细节、细部写得非常漂亮，这些地方会给人一种感觉——这本出版于1976年的小说之为文学作品而非宣传作品，正在于此。他的开篇也不错，就讲老年的格列勃夫去买家具，发现昔日滨河街公寓里的太子党廖夫卡居然变成了一个装卸工（结尾则换成了另一“工种”——墓园看门人，可见已经完全沦为社会底层）。“几乎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了”，“那时，他被失眠症和青年人的无所事事折磨着，还一心向往他后来到手的一切……”夹杂着“往事并不如烟”，回

忆那个清教徒年代的狂欢，既流露出“怎么就这样过来了”？也是“好歹也这样过来了”的心态。

又比如，在后来的日子里格列勃夫还遇见了初恋情人索妮娅，遇见了索妮娅的父亲、他的导师甘丘克——“突然，在普希金广场附近，在高尔基大街糖果点心店的橱窗后面，格列勃夫看见了甘丘克。他站在人们喝咖啡的高桌旁，用五个手指紧抓着一块包在纸里的奶油卷心蛋糕，贪婪地吃着……”这是1976年的苏联小说，1975年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里面，那位声名如日中天的主人翁，作家查理·西特林，在街上遇到声名早已烟消云散的老友洪堡——“我早已知道洪堡就要死了，因为两个月前，我在街上看见过他，他已经死气缠身了。我可没有看见我。他面色苍白，老态龙钟，一身晦气，拿着一块椒盐卷饼啃着，这就是他的午餐啊！我只是躲在一辆汽车后边看着，却没有迎上前去。我感到不可能这样做……”这是小说，也是特别真实的人生——大错已经铸成，而除了悔恨，我们又愚蠢地想得到更多更好的其他东西，继续遭受命运的辱弄。

值得一提的是，特里丰诺夫的父亲是苏军将领，在1930年代被清洗，这些经历也许都造就了《滨河街公寓》特殊的小说氛围。这么一介绍，相信不少人会想起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我更喜欢《滨河街公寓》。作为中国读者，我不知道这本小说寄托了特里丰诺夫多少“自况”与“回味”，但就小说而言，他毕竟不

是从廖夫卡的角度来“追忆似水年华”，当贱民格列勃夫与太子党廖夫卡重逢，就说明了这部小说并非“玛德琳的小饼干”唤起的梦幻曲，而是一抬头就是现实世界的铜墙铁壁。

特里丰诺夫1981年去世，作为小说家，死的未免太早了。另一个遗憾是《滨河街公寓》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全景象叙述，但中途又出现了“我”作为叙述人（当然，在我看来而已）。大概这也是“元小说”的一种吧，但无论如何，不出现“我”的视角，小说同样成立，同样精彩——那么，又何须多此一举？就我的口味而言，无论是库切的元小说还是随便哪位小说家的“多角度”，我都不想读。曾经读到某本小说里，“我”朋友打电话，而“我”竟然能告诉读者这两人的对话，宛如看电

视剧——但小说岂是这样的写法。这只是目前坊间无数畅销小说中的一部罢了，当然不能与今天谈到的小说相提并论，但也可以看出今天的创作者有多粗糙。

《滨河街公寓》除了“内部发行”之外，八十年代初外国文学出版社也公开出版，我没有比较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特里丰诺夫的小说，翻译出版的还有《老人》（外国文学）、《另一种生活》（浙江文艺）、《长别离》（选本，北京十月），我都有搜罗，但最终只读了《滨河街公寓》。倒是后来因为做编辑工作的原因，曾经与翻译家蓝英年先生有约稿，才得知这本小说他是译者之一，还知道一些当年翻译出版的秘辛。而作为深受震撼的读者，我只能告诉他，我读过这本小说，非常喜欢。📖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日关系

——兼谈19世纪末20初叶日本对华“民间外交”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甲午战争后，日本虽然从中国斩获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台湾、朝鲜半岛的利权，赚得盆满钵满，但内心却有种种隐隐的恐惧——害怕中国报复。中国毕竟是东方睡狮，一旦发出“狮子吼”，“蕞尔小国”日本如何招架得住？

因此，日本对大陆采取了首鼠两端的对策：表面上，是绥靖政策，但清朝若变成强国的话，日本难免会感到生存危机。所以，暗中支持孙文的革命党，以此来作为牵制清朝的筹码，试图以对革命党的资助，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可这种如意算盘，却赶不上形势的变化。随着清朝末期政治磁场的剧烈变动，日本对华政策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与摇摆。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统治层，害怕邻国真正出现共和国，于是，公开支持清廷镇压革命，并提供武器援助，旨在使清朝延命。同时脚踏两只船，暗中派遣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民间志士赴华，为革命派提供直接的指导和援助，旨在革命一旦成功，清朝被推翻的情况下，也能确保日本大陆政策的延续性。但无论是统治层，还是民间志士，体制内外都有一个共通而自觉的诉求，那就是日本“国益”的最大化。

邻国破天荒的革命，在日本社会引发了空前的舆论关注。仅《大阪朝日新闻》一家报纸，从武昌起义爆发的1911年10月10日到翌年3月，便发表了14篇社论，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邻国革命与日本国家利益的利害关系。更有综合新闻杂志和画报，不惜以特辑、专刊的形式，大肆报道，以唤起国民的关心。乃至有学者（汉学家稻叶岩吉）发出了“今天日本的报纸，简直成了革命党的机关报”的感慨。据后世的学者统计，以当年日本媒体的规模、数量，对辛亥革命的报道密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对75年后的1986年2月发生的菲律宾政变的报道，足见其影响之大。

大体说来，日本国内的主流舆论主要分两派：“不干涉保全论”和“积极干涉论”。前者以自由主义媒体《外交时报》和《东京朝日新闻》为代表。武昌起义后不久，法学家有贺长雄和文学家三宅雄二郎便分别在《外交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我官民对于中清动乱的态度》和《支那动乱与日本的态度》的社论和评论，力倡“不干涉保全论”。11月6日，《东京朝日新闻》再发社论阐述日清关系，强调“清国的治乱兴亡与我国运之消

长有偌大关联”，主张“对清国方针要始终一贯地奉行对内政不干涉主义，对外（列强）保全主义”。12月初，政治学者浮田和民在《太阳》杂志发表论文，主张应促成中国立宪，排除“支那干涉论”，拥护“不干涉论”：关于这个“东方最初的共和国”的国体是非问题，理应“遵从其国民的历史习惯”，实现“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自由”的立宪代议制。

所谓“不干涉保全论”，用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尾崎行雄的表述，即“将来的支那必与我国有商业上的重大关系。考虑到这一层，如果今天对其政体横加干涉的话，将招致支那大多数人民，即汉人的反感，日本将成为其永久的敌人”。可以说，这种战略思维是“不干涉保全论”的主要依据。换句话说，是一种从着眼于经济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不干涉论”，在彼时日本的政财两届，有广泛的同情。而通过支持革命来获取大陆利权的思维，其实正是这种战略的衍生物。

“积极干涉论”的代表，主要是国家主义媒体《国民新闻》和《报知新闻》，其理论代言人是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报知新闻》在11月11日和14日，连续两次刊发社论，说什么“清国的祸乱关乎我国之荣枯盛衰者甚大。对彼我两国的危机，理应加以堵塞”云云，力挺干涉论。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第一是基于维护天皇制的立场，认为“清国新立共和政体，与作为我帝国国是的皇室中心主义迟早会发生冲突”；第二是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我国如在此节骨眼上，

对他国叛乱示以同情的话”，对刚刚通过“日韩合并”置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鲜民”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一边在国内禁止危险思想传播，同时却容忍国外的危险行动，在理论上是矛盾的”；第三点是出于日本国内政治的现实需要，即军部希望以中国革命为借口和契机，实现军扩（目标是增设两个师团），其声浪之大，势难阻挡。

两派舆论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正面对决，旗鼓相当。在这种两极对峙的强磁场辐射下，各派政治势力迅速集结，重新洗牌。其结果，便演出了一场乍看上去有些分裂，其实却高度成功的对华外交秀。无论各方的初衷如何，就结果而言，不失为一次“官民并举”的朝野互动。如此高难度而又极富戏剧性的“双簧”演出，在日本外交史上，这几乎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成功案例。

1911年10月16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命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清廷通报日本将对华提供武器援助，以讨伐革命军。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革命烽火迅速蔓延，各地纷纷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次请求日本政府提供武器。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以东三省特殊权益为条件，答应了清国的请求。在10月24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制定了维持满洲现状，在与诸列强协调援助清国的同时，向中国本土发展势力的应对方针。

与此同时，顺应国内同情革命的舆论，向中国派出了“民间外交”使团，力

挺孙文革命。那个时代日本所谓的“民间外交”，多少有些类似于今天的中国，虽然身份上非“公人”，但无论外交目标还是活动资金，都与政府和财阀高度捆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由右翼政党团体大佬和资深大陆浪人组成的使团，成员清一色是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崛起的志士，也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者（虽主张“民权”，却把实现“国权”作为实现“民权”之不二路径），与孙文个人有笃厚的私谊（孙在历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漫长岁月中，于公私两面均蒙受这些日人的关照，彼此间有很深的互信）。

这些大陆浪人虽然国家主义的大背

景和政治成色大致相当，但具体的外交主张和策略却不尽相同，性格各异。“玄洋社”创始人头山满和“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二人，国家主义色彩最为浓厚，其终极的外交目标是确立日本版的“华夷秩序”。说白了，就是试图把中国纳入以日本为核心的分层秩序结构中，就像古代中国对周边的蛮夷小国那样，受贡以怀柔。当然，受制于现状的国际关系，要想实现如此“宏大叙事”的外交目标，只有推进作为“华”的日本的大国化，客观上，合理化甚至肯定对目为“夷”的中国的傲慢、欺辱与侵略。落实到现实的政治路线图上，就是作为对支援中国革命



图为辛亥革命后宫崎滔天（后排左六）与孙中山等人合影

的回报，觊觎获得日本的“利益线”——满蒙权益。

国会议员出身的犬养毅的外交观，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衣钵，希望通过列强加盟，实现对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他心中盘算的筹码是，待中国革命成功后，日本可取代俄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配地位。但犬养其人自由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了解中国的历史，懂得日本惟欲推进其大陆政策，才必不可有悖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法则的道理，性格比较柔和，做事讲究分寸感。加上其政治家出身，在政界树大根深，孙文早年从英国流亡日本时，日政府起初碍于清廷的面子，对孙文的滞留面露难色，后来却默认了事，也端赖犬养的影响力。

在支持中国革命的大陆浪人集团中，跟孙文交情最笃者当属宫崎滔天。宫崎22岁即追随兄长（宫崎弥藏）闯荡大陆，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他崇尚中国传统的“游侠”古风，为人豪爽仗义，对不少中国人（如康有为等）都有过救命之恩，可谓义薄云天，与孙文更是情同手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的厌恶和对大陆底层民众发自内心的同情，在他与其他浪人之间划下一条清晰的边界线，使他在浪人集团中显得鹤立鸡群，形象颇另类。绝大多数浪人，对近代西方列强的“对内民主自由，对外帝国主义”的双重标准式游戏规则，普遍缺乏反思，而宫崎滔天则对此始终抱有警惕并有所批判。他从扎根于某种现代性的外交理念出发，认识到中国民

族主义自身的合理性及其发展成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在犬养毅、内田良平等同侪念念不忘帮助中国以实现日本“国益”最大化的时候，当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急剧向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倾斜的时候，宫崎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也许是过于理想主义、过于幼稚，但这确是他与其他大陆浪人的分野之所在。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再次流亡日本，在东京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鉴于此前失败的教训，孙文要求组织内部，全体党员务须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并宣誓效忠。如此“革命”的清规戒律，遭到一部分元老抵制，黄兴愤而出走美国。对此，日本人支持者内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宫崎滔天赞成黄兴的意见，头山满则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但从此，宫崎与孙文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最终分道扬镳。宫崎厕身浪曲界，浪迹天涯。晚年的宫崎，越发执着于自己的信仰，不再参与中国革命。从他留下的一卷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世界大同”理想仍很执着，但同时也有某种自嘲。

对历史细加检讨可以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辛亥前后），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以大陆浪人集团支援孙文革命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民间外交”，实质上是由官方一手策划、推动的“国策外交”，旨在确保日本“国益”的最大化，是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的一环。由于孙文的“大亚洲主义”外交观与日本自由民

权运动以来，为一部分政治家和大陆浪人所奉行的，尽管已经开始变味，但尚未变得太离谱的“大亚细亚主义”发生了某种共鸣，这种外交谋略才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客观上，这种“民间外交”的推进，自然有利于中国革命进程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阻碍中国民族国家生成和发育，从而在长远的时间轴上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因素，这是我们应当看到并加以客观评价的地方。Q

伟大的二流国家

——欧洲的危机和新生

特约撰稿人 吴强（北京，qiangwu.de@googlemail.com）

从去年开始，欧洲就有政客在哀叹，世界似乎被美、中两个大国接管了，欧洲已经沦落为二流国家了。而且，伴随着欧元危机的加剧，这种危机感愈加常见了，几乎每个欧洲的大小会议上，人们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对欧洲沦为二流国家这个判断，怀疑的人似乎不多。的确，欧洲从人类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堕落成二流国家，在二次大战的毁灭性结局那一刻就开始了：超过七千万的战争死难者、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种族屠杀都令欧洲蒙上了空前的耻辱。战后的欧洲更是满目苍痍、惨不忍睹：战败国的德国大量的机器设备被红军拆

走，还要忍受国内严冬的燃料不足向法国供应煤炭作为战争赔款；战胜国的英国也好不到哪里，大批士兵复员几乎立即加入失业大军，庞大的战争债务压得几乎每个家庭都透不过气，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引发许多政治联想；1946年的饥荒则遍及全欧，欧洲人民不得不继续忍受着没有战争却形同战争一般的困难生活，连可爱的猫也被德国人民私底下唤作“阁楼兔子”充作果腹之物。其后，欧洲虽然自1950年代初开始复兴、创造了石油危机到来之前持续二十余年的繁荣，但是作为夹在美苏之间的冷战主战场，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包括欧洲人自己，几乎没



图1为欧洲著名的Bregenz水上音乐节

有人怀疑战后欧洲的二流国家地位。

直至今日，尽管欧洲的地位通过欧盟、OECD组织、G8峰会、北约以及大量的以欧洲为基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各种全球性、跨大西洋的政治联盟、国际组织、军事、经济和科技活动及国际援助充分表现出来，但是“二流国家”这个符号似乎始终挥之不去。比如2003年法德轴心被美前防长拉姆茨菲尔德讥讽为“老欧洲”，德国多次试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未遂，更糟的表现则在2009年哥本哈根的全球气候变化会议上，一个分裂的、缺乏领导力的欧洲几乎让世人彻底失望，很大程度上须为会议的失败承担责任。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曾经经历了1997年意大利金融危机考验的欧洲表现还算稳当，一度有意将欧洲的银行监管模式推向世界，无奈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后院起火，仅仅希腊一国的负债就高达整个欧元区GDP总和的2.6%。对欧洲的真正考验开始了。

当然，所谓“伟大的二流国家”的提法早已有之。就像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的提法，在国际社会一味强出头、到处煽风点火、输出革命等等战略对峙往往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比如苏联的解体命运。躲在美国驻军和核保护伞下的欧洲（西欧国家），战后借马歇尔计划迅速实现了经济复兴。以德国为例，虽然多家大厂被迫搬迁至西部，但是德国大众公司首先利用1938年建厂时就设计的原型车，大量生产并向美国出口，带动了德国

的景气复苏，这就是著名的“甲壳虫”。与“轮胎上的国家”、当之无愧的一流国家美国相比，德国的汽车工业和汽车文化毫不逊色，颇具“德国特色”。大众汽车正是建于1938年的纳粹时期，直到上个世纪末仍然保持国有企业性质，最生动地代表了资本与工会合作、国家与资本合作的“莱茵资本主义”的“德国模式”。

无独有偶，北欧的瑞典自1931年社会党执政之后，创造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平等作为经济效率前提”的社会民主模式，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和创造性建设了一整套独立的工业体系，几乎每样工业产品或者品牌都在世界享有盛誉，比如被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Volvo轿车和重型卡车、萨博的喷气客机和狮式战斗机、爱立信公司的手机和雷达、哈苏的照相机，瑞典的工程师们还是最早分别在坦克和汽车上使用增压引擎的，著名的宜家家具和H&M服装则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平价家具和服装连锁店。

这些瑞典特色工业品，无一不是民主加社会加工程师的结果，带着强烈集体主义色彩的创造，既是瑞典的骄傲，也是欧洲的骄傲。历数其他欧洲国家，不难发现一个个另类的“××模式”，构成一个丰富、多元的欧洲特色，比如法国的时装设计所代表的高级文化，比利时的卡通设计和产业，英国的音乐文化，德国和北欧的工业设计和机械文化，捷克的爵士乐和反共文化等等，让人感叹摆脱了中世纪枷锁后的世俗化欧洲在怎样发挥着

文明的创造力。而且，这一创造性产生于各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与对世界主义的关怀两者间的紧张，就像德国从19世纪初以来一直挣扎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纠结，最终走上了一条越德意志越世界主义从而越欧洲的道路，如同几乎每一样欧洲国家的“特色产品”所享有的世界声誉而构成一个世界人民对欧洲的认知。

当全球金融危机来临，这些单一民族国家的“特色”本身难以自救，Volvo和Saab的技术再好也终究被通用汽车所抛弃，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的主权债务危机则需要大幅度让渡主权才可能获得援助。但是，欧盟面临如此历史转折关头，却发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创造了欧洲统一的象征和媒介——欧元，却没有真正的货币联盟，没有建立起一个与欧洲货币体系相适应的统一政府，而且更致命的，8月17日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巴黎的会面，尽管往保卫欧元迈出了关键的一小步，却仍然是密室里做出的决定，难以消弭他们身上的“欧洲怀疑主义者”的印记。就在欧洲的社会党人大声呼吁“保卫欧元”、缅怀密特朗和科尔时期的双驾马车如何带领整个欧洲狂飙突进的美好时光，人们发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是太快以致新欧洲与老欧洲出现裂痕、南欧国家狂借债、绑架德法的问题，而是一体化进程太慢、核心欧洲举足不前。

自1950年欧盟之父舒曼提出煤钢联营共同体计划以来，从欧洲经济共同体



图为 哈贝马斯

发展到欧盟，伴随而生的官僚主义并非主要问题，面对危机时一次次表现的治理能力不足和欧洲团结才是问题所在。所幸，每当危机时刻，外界都能看到欧洲社会的反思，这个建立在对欧洲曾经承受巨大的现代性苦难的反思，在如何一次次地主导着反危机的进程，直至寻找出一条同时包含问题解决和理想主义的道路，然后不断推进着欧洲的一体化和进步。其中的代表声音，来自哲学家，也来自独立的宪法法院。哲学家首推哈贝马斯，在巴尔干危机和干预的关键决策阶段、在欧洲宪法草案的关键讨论阶段，哈贝马斯不仅都未缺席，而且在这两个

重要时刻都表达了极有影响的意见。在保卫欧元的关键时刻，今年4月6日，哈贝马斯再次发声，呼吁警惕德国的“重新民族国家化”，包括有学者提出“回到德国马克”的民粹主张、德国愈益增强的自我中心主义与欧洲的统一化进程背道而驰。他对过去两年颇有“危机明星”的默克尔发出警告：习惯密室政治、甚至在家中与物理学教授的丈夫商量是否出手拯救希腊的默克尔，她的决策方式是危险的。哈贝马斯指出，欧洲现在欠缺的是欧洲的公民社会和欧洲公民社会对欧元危机的广泛讨论。否则，任何欧元拯救计划的合法性都可能存在问题，并且加剧欧洲公众对政治精英的疏离感，从而背离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对公民社会、公共空间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强调，可谓欧洲政治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显著的“特色”，也是欧洲民主的双重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以此，甚至可以区分所谓二流国家与所谓一流国家：在欧洲，舆论领袖们有41%更倾向于公民社会组织，只有28%看重企业界，只有17%更看重政府；而在美国，40%更看重商业，46%偏向政治机构，只有34%注重公民社会组织。由此不难看出，即使真的有所谓二流，那也是人民自己的选择，而他们才是治理的主体、应对危机的根本力量。2009年德国宪法法院对德国加入里斯本条约的合宪性的裁决已经指出了问题所在：欧洲议会选举的代表性不足而致合法性不足，不足以代表欧洲的公众和民意。以致在欧盟决策和欧洲公众

之间，面临如何拯救欧元的时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合法性真空，妨碍了欧洲各国有效地采取实质性行动。

不过，危机恰恰意味着机会，德国前外长菲舍尔，这个德国也是欧洲绿党的代言人，多年前已经从拒斥欧洲统一转变为极力推动，在今年4月6日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和美卡托基金会主办的五贤人讨论会上呼吁，只有采取措施大力推进欧洲一体化才可能解决欧元危机，否则，任何技术性的措施只能意味着不进则退。他完全赞同哈贝马斯的主张，而且希望建立一个欧洲政府的实体，更确切的说，就是“United States of Europe”——欧洲合众国，来执行统一的欧洲经济和货币政策。相比英国工党理论家吉登斯两年前提出的建立世界经济政府的主张，菲舍尔的欧洲经济政府并不激进，只比争论中的“Federal Association”（邦协）的主张更进一步，却同样代表着社会进步和欧洲国家的团结。进步、团结，这些充满社会民主色彩的主张，在那些所谓一流大国的政治舞台上绝少听到，却彰显“二流国家”的伟大。

各具特色的欧洲各国需要扩大相互间认识、交流和团结的公共空间，消除法、德公众之间至今仍存的相互误解、东欧新成员国对老欧洲的成见，否则，公众冷漠会助长欧洲国家面对欧元危机的无所作为，任何拯救欧元的行动都会因为远离欧洲公民而失去支持。在欧洲经济政府之前，至少有一项政策可做，并且符合欧洲公民社会和欧洲政府的方向，

那就是发行欧元债券，从货币机制和政治机制两方面将每一位公民与欧洲的责任联系起来，为未来的欧洲经济政府打下基础。9月7日，德国的宪法法院认可了EFSF（欧洲金融稳定机制）这个诞生于2010年7月欧元危机最严重时刻的金融机构，消除了德国参与拯救欧元的法律障碍。8日，意大利政府也提案修宪，在宪法中增加平衡预算的黄金法则条款。经过知识界、媒体、和公众的批评、讨论和倡议，欧洲已经行动起来了，尽管在走的快慢问题上还有争论，在未来目标上仍有存疑，但方向是确定的，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的梦想，菲舍尔口中的“欧洲合众国”的雏形开始在欧元危机中渐渐清晰起来。Q



那些消逝的艺术杂志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友人从欧洲回京，约一千朋友喝酒，谈中国本土时尚杂志，其前世与今生、现状与问题。友人原本以此为研究对象，做过详实的田野调查，写了厚厚的学位论文，可既成的结论却在哥几个一通“狂轰滥炸”之下，顷刻瓦解。我们说，时尚这块，在这个国家基本不存在。那些冠以

“时尚”的刊物，其实并不是时尚，无非是时装杂志、汽车杂志、旅游杂志、家居杂志、美食杂志……罢了。

话虽“粗暴”，可话糙理儿不糙。不是么？只需检索一下过去十年来时尚系主流刊物的内容，你会发现，前五年是年薪50万元的编辑教年薪50万元，甚至500万元的大款如何品法国红酒和哈瓦那雪茄；后五年，主要功课是教人打高尔夫和马球；中间，则以环球旅行和汽车美学贯穿过渡——这，就是中国时尚。

时尚编辑们太害怕落后于“主流”了。但，时尚是什么？时尚恰恰是反主流的，或者说反主流才是时尚的催化剂。德国哲学家西美尔发现：“保守性和易变性以非常不规则的方式分布在一个政治群体的不同阶层中。下层群众很难产生变

动，发展也较为迟缓……最高阶层恰恰是有名的保守阶层，常常过分保守，仅仅以最笨拙的节奏向前发展。而中间阶层是真正富于变化的阶层，因此，自从第三等级夺取领导地位以来，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历史也以全新的速度行进。”试想，假如没有中产阶级一波又一波反潮流的

“僭越”，今天有哪一样被看成“时尚”的物事能落地生根？从这个意义上检讨国中“时尚”，简直没一样不可疑。一方面，紧跟“主流”，唯恐被甩掉；另一方面，对有可能衍生为新时尚的社会景观及其代表人物避之唯恐不及。当下话语中的所谓“时尚”定义，实在是被去势的、大大窄化的犬儒小清新，就时尚的本质而言，根本就是伪时尚，甚至是反时尚的。

美国超现实主义摄影家李·米勒（Lee Miller）作为艺术家出道前，是《Vogue》杂志的签约女模特，风华绝代，是超现实主义运动早期（巴黎时期）蒙巴纳斯的头号“缪斯”，令众多艺术家为之癫狂，前情人曼·雷甚至尝试自杀。然而，1944年，如此尤物却作为战地摄影记者，身穿大号军服，化装成盟军军官，解放



奥斯威辛集中营。若不是后来巾帼真身暴露遭禁闭，险些参加诺曼底登陆。随着她发回的菲林陆续在《Vogue》杂志发表，纽约的时尚系小资读者们，在看到战争残酷一面的同时，也刷新了对时尚的理解。在那个时代，没有比一身戎装的李·米勒，对着不远处加农炮的着地点或刚刚断气的敌军士兵的尸体举起莱卡相机的姿态更性感、更时尚的了。

所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编辑没文化”，说的应该就是时尚系。而要想做得有文化，显然不能光靠教人开红酒、在草坪上抡杆，还要着眼于生活方式背后的核心价值理念，谈一点艺术。近年来，本土时尚系显然意识到了这方面的价值，对前卫艺术不惜版面，动辄以特辑、专号的形式大做特做，甚至创刊时尚版的前卫艺术杂志。可只需稍加浏览，便可发现，他们视野中的艺术生态，基本上是艺术拍卖的代名词。能进入编辑法眼的艺术家，连排名顺序都与佳士得、苏富比拍卖行的春季拍卖图录惊人一致。如此对艺术的关注，不消说，是帮闲，是分羹，拿艺术说事而已。这种玩法，既与艺术无关，也不够“时尚”。

不能不说，我们的文化艺术类媒体生态是大大退化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京沪宁深等一线城市，均有品质差强人意的图文艺术刊物。我记得当时深圳有本月刊志叫《街道》，风格前卫，视角尖锐。那时，经济转型启动未久，尚未触及媒体，邮局

图为战地上的李·米勒



报摊上的报刊杂志还是清一色机关报，腔调仍不脱新华体，纸张则是那种又薄又粗的泛黄的草纸，在这种纸张上单色印刷的文字图片，其效果可想而知——也就是聊胜于无。

一个冬日的午后，在风入松书店的新书台上，一本彩色封面，内文以铜版纸印制的杂志进入了我的视线。那种版式、高清晰的图片，简直跟我在国外看到的文化周刊一模一样，我几乎在捧读的第一时间就爱上了它。后来才知道，在当时尚不大为人所知的肖全，是那本刊物的“御用摄影师”。我头一次亲近那本后由中国电影出版社付梓的著名摄影集《我们这一代》中那些文化大腕的经典肖像，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对我来说，真不啻是本雅明



话语中的“灵光”一现。但就是这本《街道》，九十年代末，因某期封面上刊用了一帧多少有些挑逗意味的半裸女子翘臀的背影图片，被停刊。遗憾的是，最后一期的封面，也因刊物被悉数回收销毁而终不得见。

接着，闯进人们视线的，是南京的《光与影》、上海的《书城》杂志；原上海文艺社伞下的老牌刊物《艺术世界》也重新包装登场，颇为抢眼。彼时，新闻出版圈流行“读图时代”的说法，时髦的出版

媒体人言必称“图”，非“图”不做，“图”成显学。湖南文艺出版社在京城创办的前卫艺术杂志《视觉21》，高调推介西方当代艺术，为1989年中国美术馆现代艺术展以降的本土前卫艺术大胆正名，风头之健，一时无两。同样性格的艺术刊物，还有《现代艺术》、《新潮》和陈逸飞主导的《青年视觉》等等，无一不是走以高品质图片的视觉性取胜、印制精美、价格曲高和寡的高端路线，但却为文青、艺青们趋之若鹜。在笔者的记忆中，截至21世纪初，时尚系真没戏——这是本土视觉杂志（Graphic Art）的中兴期。

然而吊诡的是，2002年以后，随着前卫艺术的被政治正确化，以前在郊外的画家村因行为艺术表演而动辄遭警察取缔的光头艺术家们入主798、草场地，成了京沪商业画廊的宠儿，视觉艺术杂志的生命却也走到了尽头，《光与影》、《视觉21》、《现代艺术》等相继消失，未消失者，则不得不改版，以去前卫性、强化商业性来谋求存续，苟延残喘。不出十年光景，国中文化艺术杂志拼图被彻底改写。今天，尽管坊间各种冠以“艺术”、“前卫”、“当代”的、印刷品质和容量不输时尚系的杂志碰鼻子碰眼，但以编辑、评论家的学术标准独立运作，不仅不从艺术家那儿征收“版面费”，而且评论文章发表后还能给作者支付菲薄稿酬的纯粹艺术杂志却几乎绝迹。是耶非耶，也只有交给历史去评说了。



巴黎解放。李·米勒与毕加索老爹 巴黎 1944年



ART

究竟是先有好的艺术，还是先有靠谱的艺术媒体？这几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论证。但是，你难以想象，假如美国没有《ART News》，法国没有《电影手册》，日本没有《艺术手帖》和《艺术新潮》的话，或者假定这些刊物有则有矣，但都是靠向艺术家征收“版面费”来维持存续的话，那个国家的艺术生态会变成何种状况。而一个社会的传媒生态中，若严肃的艺术媒体长久缺席的话，会对那个社会的文化和人的性情造成和何种影响，便不言而喻了。🔴





城市光影两则

观察员 言一（成都, richard7briner@gmail.com）

Cluster 1: Notebook On Cities & Clothes (城与饰的速写)

至今我依旧不明：为何这部名为 *Notebook On Cities & Clothes* 的纪录片会被译作《城市小调》。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次对于城市与服饰的速写。城市是东京和巴黎，而服饰却不仅仅限于山本耀司的手笔。在35mm胶片与DV监视器所呈现的不同画质画面的反复交叠与切换中，文德斯自己似乎也历经了一场对于影像本身的质疑和反思。

片中山本耀司毫无遮掩地道出：在去了那么多次欧洲之后，我更多地将自己认同为东京人，而不是日本人。这几乎就是在暗示城市，或者是城市的网络将成为一部分人的自我认同之客体。事实上，在这部电影拍摄完毕的2年之后，我们便读到了Saskia Sassen的*Global Cities*。

然而，比起之前对于身份认同的敏感，最为吸引我目光的还是山本耀司对于时尚与服饰的认知。我甚至按图索骥地找到了那本被他视若珍宝的摄影集——

找到之后才发现，原来不只一本，而是七册一套，按年代划分，纪录了那些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August Sander, *People of the 20th Century* (7 Volume Set, Harry N. Abrams, 2002)**。在翻阅这套摄影集的时候，山本耀司极爱玩一种近似于犯罪学中profiling的游戏，也即，从那个人的衣着上去试图判断ta的职业或某些生活的特征，然后再去对照照片下的文字说明，看看自己的推测正确与否。

正确与否呢？自然有对有错，不过重点却是在于，山本耀司究竟看到了什么？——正如约翰伯格曾教导我们的那样：the way of looking (is important)。在山本耀司眼中，摄影集中的人莫不拥有一种源自于真实性的美感。这种真实并非是单指摄影层面的写实，而更多地在于“他们身上的衣着仿佛是为他们天然而生的；当你将目光落于那些服饰之上时，你会觉得它就应该对应着这样一个人和他背后的全部生活。所以他们看上去是那样的美丽”。这当中，似乎存在了一种衣着与身体，乃至作为个人的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





你能看到，山本耀司确实有直接借用摄影集中人物服饰的某个特别的款式局部；你也能听到山本耀司坦诚自己对于材料的倚重，毕竟他在一开始是从母亲的裁缝店里一手一脚做起来的。只是，在这种借用和倚重背后，我所看到的却是山本耀司的设计策略。他并不总是如同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以外形以线条来作为设计的出发点；相反，他可能一开始就将某个细节放在了自已设计的核心。这个细节也许是摄影集上看来的一款特别的衣领，也许是激发灵感的新型面料。换句话说，在设计当中，有某种细节从一开始就与统摄整个设计的理念紧密呼应着，而整个设计的过程便是以其他大量的细节工作来填平从理念到具象的鸿沟，去支撑

该细节对于理念所造成的荷载。这使得一个设计团队成为必须，一如建筑设计中的结构工程师。

必须承认，正当我不堪眼下所谓时尚类人像摄影的茶毒而对摄影产生某种厌恶之时，山本耀司颇为及时地为我推开了一扇窗。于是，我并没有止步于August Sander的*People of the 20th Century*，进而翻开了Julia Foulkes的*To the City: Urban Photographs of the New Deal*。

原来在1920年，当美国人口普查表明彼时的城市人口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时，一个名为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FSA)的部门竟出资雇佣了一批摄影师，让他们去拍下生活中具



体的各种变迁，以便对这一人口变动的趋势有所估量。这一规模不小的拍摄计划由于美国的最终参战而终止，FSA所保管的拍摄档案亦在42年被划归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管理。然而，这二十多年的拍摄却已经足以向我们呈现出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各种交叠画面——不论是城市向乡村的扩张，抑或乡村向城市的移民。

具体到*To the City: Urban Photographs of the New Deal*中，Julia Foulkes所选择的摄影作品主要集中在1930-1940年间，从书本的目录便可以读到Julia对于这些摄影文献的编织颇具匠心。Chapter 1: Intersection——



城市化进程中,某些因子/表征物的出现往往如同变异,总是突如其来,在周围的环境中显得突兀,引人注目,就像对于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里的中国人而言,第一家KFC或是星巴克的到来总是那样的impressive。Chapter 2: Traffic——交通,既包括了城市内部的交通,也包括了乡村间的交通。而当城市与乡村,被各种各样或新或旧的交通工具/方式所串联时候,我们又是否能从那些黑白的影像中辨识出所谓城市化的光谱呢? Chapter 3: High life and low life; Chapter 4: The city in the country; Chapter 5: Citizens……翻读到最后,由于每次看照

图为Howard R. Hollem, New York, New York, June 1944. “Victory gardening at Forest Hills”

片都需要将书本顺时针转动90度,我也索性开始玩一种类似于profiling的游戏:我直接跳过了位于每个章节开头的文字,而直接凝视照片和照片的说明本身,直到看完照片之后,才回过头去看看那些文字是否道出了我心中所想。

Cluster 2: In Memory of Old Gosts (城市里的旧灵魂)

翻阅这本*The Quiet Hours: City Photographs* (Mike Melman,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2003)的前言时, Bill Holm引用的诗歌深深地攫住了我,让我心底涌出一股近乎不可抑制的冲动,想要打破先前的计划,一头埋向Whiteman,去看看他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究竟怎样在纽约城里穿行或安坐,审视着这个世界的悲伤。

最初吸引我的,正是书名所暗示的:一座城市的寂静,会以怎样的方式被摄影所呈现。出乎意料的是,打开扉页一看:作者Mike Melman竟是一名执业建筑师,出生于纽约Bronx,分别曾在曼哈顿下城的库珀联盟建筑艺校和加州伯克利学习建筑。如此一来,恐怕没有什么比一名建筑师透过黑白镜头所呈现的城市更加令人期待了。

然而,期待总是被意外打破。Mike Melman镜头之下的城市并非他出生且熟悉的纽约,而是转到了著名的双子城Minneapolis。我亦随之补上美国城市史的又一课:在20世纪50年代末,城市复兴(Urban Renewal)法案的出台直接导致了老城区Gateway District的灰飞烟灭。其中,又以在1961年被推平的The Metropolitan Building最为令人扼腕。平整后的Gateway District成为了生长各种所谓modern architecture的沃土。最为吊诡的或许还在于雅各布斯的名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5月)恰好也在1961年出版发行。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另一种“生逢其时”。

Edwin Hirschhoff拍摄了超过400张的照片,既记录了老区建筑在被屠戮前的影像,也有它们被(侮辱与)损毁时的境况,更有它们在被推平后空旷空无一人的街区与街道。这些照片最终成就了一本名为***Down and Out: The Life and Death of Minneapolis's Skid Row*** (Edwin C. Hirschhoff,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2002)的书。

书,我无法读到;书名却是让我在第一时间联想起帕慕克来(然后才是马丁西科塞斯的《穷街陋巷》),想起他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比起Minneapolis来,伊斯坦布尔不是一座更为纯粹的双子城(twin cities)么?而那里同样布满了近乎于奥斯曼帝国遗迹的后街(backstreet)。在帕慕克的眼里抑或笔下,这些后街是迷人的——在那里你能够遭遇到各色各式过往生活的痕迹,甚至气息——而这,也几乎就是Bill Holm对于Melman镜头内容的总结:

单纯的怀旧带有某种危险。过去的时光,并不等同于黄金年代或香格里拉。Melman镜头下所呈现的场景,不论它们是昔日的教堂,车站,铁路,卧室,咖啡馆还是废旧的电梯;它们都只是日常生活的碎片。因而,这些空间也因此刻写着过往城市生活的脉动。只是,透过摄影,我们得以辨析那一度被忽略的美。(此段为意译)



*The Quiet Hours: City Photographs*中的照片大多拍摄于上个世纪90年代。如果Bill Holm所言非虚（尤其是考虑到城市总是善于隐藏），那么你将看到，同样是一些可以追溯至该世纪20-30年代的城市生活痕迹。而这当中，令人难以置信地混杂着诸多时点上的巧合：美国最大最“辉煌”的商城Mall of America与1992年建成于Minneapolis南郊机场附近，书中不少照片也正是拍

摄于92-93年；一开始，我并不十分理解Bill Holm为何说：1939年对于美国是一个近乎分水岭的时点，在他看来郊区住宅的兴起，人们从老城区的撤退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作者Melman之出生于1939年，对他已然是一种宿命般的暗示。只是，在我看来，其背后还有一个更加solid也更加残酷的巧合在于：成功帮助Minneapolis政府与地产商推到The Metropolitan Building的The

图为Southeast Steam Plant and Stone Archbridge, Minneaponis,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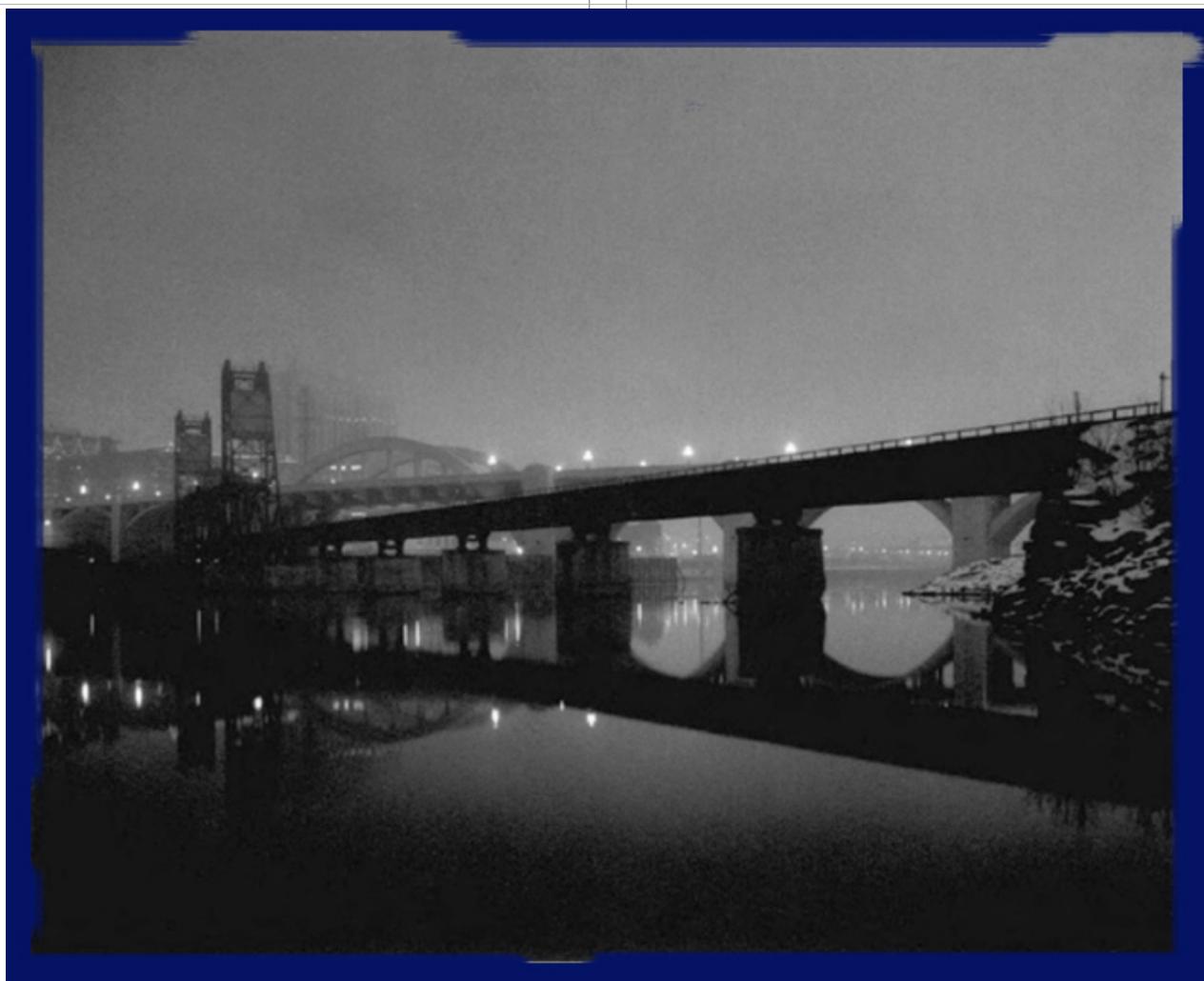


ART

Housing Act也正是在1939年成型——Minneapolis的事实证明，这个原本意在帮助城市低收入阶层购房置地的法案，显然于实施中悄然变形。

最后一个巧合是关于帕慕克的。没有记错的话，伊斯坦布尔大约也是在1952年，也即50年代开始了城市的大规模改造。不少奥斯曼时期的房屋别墅，也都是在这个时间段被湮灭。正对应着Minneapolis的“城市复兴”。

在Melman的作品中，既有工业时代的厚重遗迹，也有不少已然荒芜的室内空间的呈现。作为一名建筑师，你能看到他作品中对于空间细节的敏感，对于光的捕捉，就仿佛那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光，旧时的灵魂正从同一个窗口望将过来，眼神里满是静谧和忧伤。在那当中，我没有继续看见那个我们所惯常见到的乐观，信奉发展，生机勃勃的美国，却仿佛在恍然中看到了某时某刻的中国。📍



图为Railroad Lift Bridge and Robert Street Bridge, ST.Paul , 1995





哲学、传统与教化

——与Vittorio Hösle教授的访谈

特约撰稿人 黄晶 (柏林, liufang0815@gmail.com)

V. Hösle先生是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德语及俄语文学系Paul Kimball讲席教授。他同时也兼任哲学及政治学两系的教授,并于2009年起出任圣母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在过去的30年间,他出版了35种著作,其中《黑格尔的体系》(*Hegels System*)、《道德与政治》(*Moral und Politik*)与《哲学对话录》(*Der philosophische Dialog*)等书尤为知名。



生平

1. Hösle教授,您能否向我们简略介绍一下您的生平、求学经历及研究兴趣?

自传性的评述常常显得自命不凡,但它却能帮助他人理解一个哲学家的潜在动

机,因此或许有其合理性。我于1960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我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父亲则是讲授罗曼语文学的德国教授。我们在家中使用的意大利语交流——比起真正的德国人,我们更像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生活在德



国却寻找每一个机会返回意大利。在6岁时，我费力地学习德语，并觉得自身始终更具有意大利人的特质。

当我从人文中学(Humanistisches Gymnasium)毕业时，我的年纪尚不到17岁。人文中学给予了我严格而优质的教育：从五年级起，我们便每日学习拉丁语；11岁时，我开始自修古希腊语。1977年秋季我进入Regensburg大学学习，并最终在21岁时于图宾根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波鸿和弗莱堡也曾是我的求学之地——当时德国教育系统的优势在于学费全免且学分极易转移；所以你能在许多地方学习并熟悉不同的学派。而讲授课(Vorlesung)的制度也十分卓越，你能从中获得对一位专家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的概观，此外还无须写论文，所以你仅仅需要吸收与消化。我的主修专业始终是哲学，而辅修专业由最初的科学史和拉丁文变为古希腊语和梵文。那时的德国大学仍是一个求知的天堂，而我则有幸在一些最杰出的学者那里学习。

在求学期间，我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柏拉图与黑格尔。我被他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所吸引，同时，哲学史是否并不仅仅是相互冲突的诸多观点的汇聚这一问题也困扰着我。我的博士论文——也即我的第一部书——《真理与历史》(Wahrheit und Geschichte, 1984)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筹划了一种哲学史的哲学，而后半部则用这一理论来处理古代哲学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的发展。我将巴门尼德、阿那克萨戈拉与智者分别对应于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与现代启蒙运动，而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哲学则被我视为重建伦理学以及关于理性形而上学的尝试，它们展现出与康德哲学及德意志观念论的许多相似之处。我试图将黑格尔哲学史讲义所体现的系统进路与新的纂史知识结合，在我的第二本书《悲剧在索福克勒斯晚期作品中的完成》(Die Vollendung der Tragödie im Spätwerk des Sophokles, 1984)中，我提供了一个由黑格尔美学所激发的对希腊悲剧之发展的解释。多年后，我再次回到上述两个主题：在《解释柏拉图》(Platon interpretieren, 2004)这部文集以及研究哲学对话录文类的专著《哲学对话录》(Der philosophische Dialog, 2006)中我回到了柏拉图，而在《希腊三大悲剧家之级序》(Die Rangordnung der drei griechischen Tragiker, 2009)这部专著中则回到了悲剧家。

2. 在一开始，您谈到了您家庭的意大利背景。我感兴趣的是，您是否也受惠于意大利的思想传统？它与德意志传统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您能否谈谈意大利学术界的现状？

伟大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曾举出四位对他影响最大的作者——我自己也将维柯视为在柏拉图和黑格尔之外对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作者。我有幸与Christoph Jermann一同将他的代表作第一次完整地呈现给德语读者。他教会了我将朝向法权国家(Rechtsstaat)的缓慢发展按照其内在的逻辑



来加以理解。另一位伟大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绝非仅仅作为一个对立面而对我产生吸引力：尽管他对道德与政治的分割是不可接受的，但权力具有其自身的逻辑，我在《道德与政治》第五章中对此加以探究，正是在这里我不断回溯到马基雅维利。我所最喜爱的第三位意大利作家当然是但丁，在一篇更长的文章中我比较了《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它们或许是基督教欧洲最伟大的诗作。

与德意志人文科学传统相比，意大利传统更以经验为导向，因而缺乏前者所拥有的理论根基；维柯本人对于人文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奠基的兴趣也远不及黑格尔。克罗齐尽管身为一名重要的人文学者，却是一个糟糕的哲学家；遗憾的是，在他之后，意大利的学院哲学主要以哲学史，而不再以系统为指向。与德国大学相比，意大利的大学甚至处于更为恶劣的状态之中，它们不仅资金短缺，而且也缺乏对绩效公平的保证。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拥有欧洲最古老大学的国家毁掉了自己的大学。

3. 您还谈到了在Regensburg所上的人文中学。而如今您的孩子在美国上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所提供的教育与您所受的人文中学的教育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吗？您觉得各自的优劣在哪里？

我还属于那种10岁便开始每天跟优秀的老师学习一个小时拉丁语的特权阶层；根据学校的安排，在四年后我们才会开始希腊

语的学习，但我自己11岁时便已经开始自学希腊语。如今，人文中学的伟大传统即便是在德国本国也仅以一种退化的形式存在，在美国则从未有过同类中学系统（尽管在耶稣会学校中有其初级形式，但他们极少教授希腊语）。令我痛心的是，我的孩子不得不比我当年推迟两年才开始学习拉丁语，并且是在一所私立学校，因为这里的公立学校并不提供拉丁语教学。不过，我必须承认，美国学校确保了一种更大的社会活动性；而传统的拣选则大多由父母的教育背景所决定，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意义上，为社会正义之故，我接受我的孩子所受的质量下降的教育。

4. 您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分别是哲学、古典语文学和印度学(Indologie)，您为何会选择这样一种组合？您决定学习印度学是因为它与您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有什么紧密的关联吗？

这一选择并不容易，因为我的兴趣非常广泛。选择古典语文学是因为我很好地掌握了古代语言；而印度学之所以吸引我，则是因为我希望了解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这一兴趣大概也解释了我后来为何会娶一位韩国妻子。对于异文化的学习无疑帮助我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内考察欧洲文化，并看到其界限。

5. 您先后游历了好几所大学，也曾追随许多老师学习，其中最为您推崇的是哪些学者？



我的哲学老师包括 Franz von Kutschera、Häns Kramer 和 Dieter Wandschneider, Kutschera 是一位非常广博的分析哲学家, 而 Krämer 不仅奠定了新的柏拉图阐释, 并且提供了一种严格的解释学理论, Wandschneider 作为一位杰出的黑格尔研究者写有质量极高的黑格尔逻辑学与自然哲学论著, 并将自然与技术哲学的传统带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哲学上对我产生影响的师长还有 Klaus Düsing 和 Werner Beierwaltes, 前者是一位专注的康德研究者和德意志观念论史家, 后者则由于阐释新柏拉图主义及其对德意志观念论的影响而闻名。此外, 我还有机会师从机智而极富原创性的数学史家 Imre Tóth, 全面的中古神学史家 Charles Lohr, 著名的宪法学者和法哲学家 Ernst Böckenförde, 以及与 Krämer 共同创立了图宾根学派的古典语文学家 Konrad Gaiser, 而迄今为止我曾遇到过的最伟大的学者则是梵文学家 Paul Thieme。

6. 您刚刚谈到, 著名的希腊哲学研究者 Konrad Gaiser 也是您的老师之一, 我很想知道, 他作为古典学者是否以一种与 Krämer 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您的学术道路, 如果是, 这一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黑格尔专家 Wandschneider 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 而 Krämer 则是这篇论文的第二评议人。作为语文学家, Krämer 与

Gaiser 的责任在于确保我对于古代哲学的解释在语文学上是可靠的, 即便这一解释是以黑格尔精神为导向的。他们两人均向我指明了如何有意义地解释柏拉图, 不同的是, Krämer 的兴趣偏向于柏拉图哲学的奠基结构 (Begründungsstruktur), 而 Gaiser 则对对话录的艺术形式更感兴趣——而要正确理解既是哲学家又是诗人的柏拉图, 二者均是必需的。

7. 您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 您近年来与 McDowell 和 Brandom 关于对德意志观念论阐释问题的讨论也尤其令人关注。您是否也受到了英美哲学的影响?

在进入大学之初, 我所师从的是分析哲学家 Kutschera, 但遗憾的是, 此后分析哲学长久被我忽视。然而今天我却将一些分析哲学的著作视为不可或缺的质量标准——我所推崇的分析哲学家包括 Moore、Ryle、Hare、Strawson、Quine、Chisholm、Kim、Plantinga、Chalmers、Rawls、Kripke 以及 Searle。事实上特别有趣的一个问题是: Sellars、Brandom 和 McDowell 如何再次走向了一种客观观念论 (einen objektiven Idealismus)。

8. 您为何决定接受圣母大学的教职, 并在此地继续您的研究和传播您的学说?

我的第一个终身教授的职位是在美国,



但不久我便返回了德国，因为我感到自身与德意志文化紧密相系。然而此后在德国的经历整体而言令我沮丧：太多不合格的学生，教授的成果无人审核，政府部门的荒谬规

定，还有德意志民族普遍的文化衰退。在圣母大学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的自在，我终于能想象在此地度过我的一生。当然，我对于新的经验始终是敞开的！

哲学

1. 您曾说过，您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视为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四位思想家。您能否谈谈这一断言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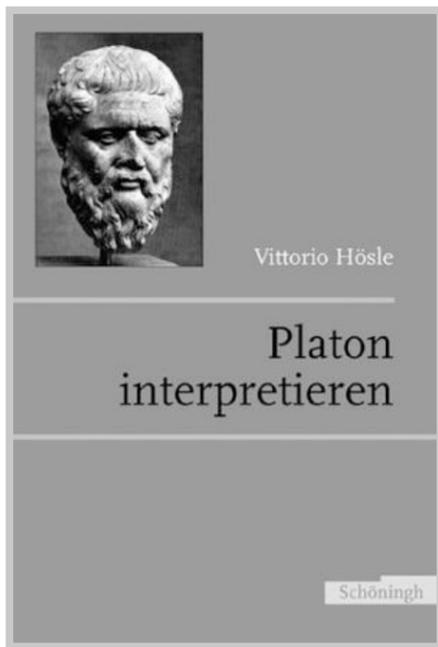
广度与深度极少相互关联，但在这四位思想家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二者的结合——他们不仅跨越几乎一切哲学领域，并且在精确地论证他们的命题时带来巨大的革新性。

2. 在上述四位哲学家当中，您认为黑格尔和柏拉图甚至更高一筹。关于这两位哲人，您也各写有一部作品——《黑格尔的体系》和《解释柏拉图》。您在什么意义上将柏拉图和黑格尔视为在哲学上胜过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

柏拉图与在哲学上受惠于他的亚里士多德不同，他不仅是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因此，我判他获胜。黑格尔建构了一个整合诸多哲学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体系，而这一系统在康德那里仅仅初具雏形；康德并未真正领会人类精神的历史性，黑格尔则将这一重大的发现融入了他的哲学体系。

不过，康德的论证常常更为严格——重构黑格尔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令人获益良多。

3. 我们刚刚谈到的这四位哲学家当中，两位是希腊人，两位是德国人。您的研究的一个特点正是将德意志古典哲学与希腊哲学相联系。在您看来，这一连接的合法性何在？



《解读柏拉图》

Hösle 著作



在1800年左右，德意志文化开始将自身理解为希腊文化的一种新的显像形式——德意志观念论依据时代的要求推进了柏拉图哲学，希腊艺术则启发了德意志的建筑与诗歌，而德意志古典语文学也取得了世界最高成就。然而，今天这一切几乎已不再留存。但我相信：柏拉图的客观观念论在1800年前后为何能通过谢林和黑格尔在一个现代形式中再次显现，理解这问题是极其重要的。这使得客观观念论革新的可能性再次出现。我想，我们大概不必寄希望于欧洲，但或许应当寄望于美国——或中国？

4. 柏拉图和黑格尔是您最喜爱的两位哲学家。您将他们的哲学均视为客观观念论，而且您自身同样发展出了一套类似的观念论体系，这显然与大多数当代哲学家持有的反形而上学或自然主义的立场不同，那么，您认为客观观念论对于当代哲学可能有何贡献？

客观观念论具有诸多优点：它不仅承认一种永久有效的德性法则(Sittengesetz)，并且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心灵历史发展的理论；它认识到了经验论的弊病，但又避免了像建构主义(Konstruktivismus)那样宣称：我们的概念建构会让我们与现实相分离；它坚持心灵的不可化约性，但也不否认其乃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按照这一理论，自然的目的在于心灵的创生。

5. 心灵哲学在今天已成为英美哲学的

主流。客观观念论对于其中极受关注的身心问题提供了怎样的回答？

在我的对话录《Encephalius》当中，我为一种改良过的平行论做了辩护：我将一种伴生理论(Supervenienztheorie)与一种对自然发展的目的论解释相结合，根据这一解释，自然发展引发了必然与之在逻辑上相系的诸多心灵状态，即使它们伴生于各种物质状态。既然这一结果不能以演化论的方式(evolutionstheoretisch)得到解释，当我们拒绝互动论(Interaktionismus)时，我便假定，自然法则是以目的论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这就指向了创世信仰(Schöpfungsglauben)的一种形式。

6. 既然您自身的学说与黑格尔哲学紧密相系，我感兴趣的是，您如何评价分析哲学家例如Brandom和McDowell等人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新解释，据我所知，他们的解释也深刻影响了德国当下的黑格尔研究。这一连接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独特进路有何问题？

在我看来，眼下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重新表述传统的基本思想，尤其是伟大的系统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我因此为黑格尔主义与美国分析哲学的融合感到极为欣慰。所谓大陆与分析的对立并不恰当，只有好/坏哲学的对立。我认为Brandom与McDowell的主要问



题是，他们未能创造性地汲取黑格尔概念生成(Begriffserzeugung)的方法，也即辩证法。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对概念生成这一问题的关注，他们的研究就整体而言是形式主义的，而未能澄清心灵在历史中具体的显现。

7. 关于英美哲学家对于德意志传统的重建，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德语世界。在德国当代哲学家当中，中国学界相对熟悉的只有哈贝马斯和Dieter Henrich。您能否越出他们之外，谈谈德国哲学的重要趋势？眼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德语作者和作品？

不再有世界知名的哲学家产生，这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这既与创造力的普遍衰退，也与接受过程的扩散性相关——哲学家实在太多了，而种种学说的有效性要获得承认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我看来，Kutschera是德国最为广博的分析哲学家，Hermann Schmitz是极有趣的现象学家，Manfred Wetzel则是一位深刻的系统思想家。而在那些曾尝试重构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当中，我始终觉得Dieter Wandschneider尤其具有原创性，因为他揭示了黑格尔自然哲学的不可扬弃并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对黑格尔辩证法重构的尝试。

8. 百科全书哲学家(Universalphilosophen)的理想在德国具有一个悠久的传

统，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卡西尔及布鲁门伯格等均属此列，然而德国哲学界年轻一代似乎开始转向膜拜新的“论证文化(Argumentationskultur)”(Dieter Henrich语)。您认为，这一新趋势对于德国哲学有何利弊？

我之前所谈的内容已经蕴含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伟大的哲学既是全面的，在论证上又不失敏锐。二者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今天，人们更加致力于精确性，这很好，但当对整体的通观丧失时，哲学的专门化将会阻碍创造性：因为论证只有在一个整体当中才能发挥效用。

9. 从您的研究，例如《哲学对话录》这部专著当中，我们了解到，在您看来，论证对于哲学而言尽管十分关键，但哲学绝非仅限于此，文学要素在哲学话语中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样我们现在便面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您能否谈一下您对这一关系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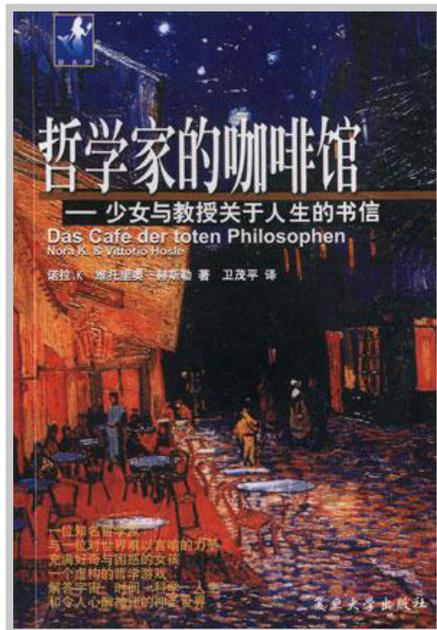
黑格尔美学提供的最具效力的洞见之一便是，艺术具有一个真理宣称(truth claim)，但它并非普通的真理宣称：吊诡的是，正是艺术的虚构本质使得它比哲学更早地把握住真理。我对于文学的兴趣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有助于澄清伦理和政治问题——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比方说，便是一座储存着大量政治洞见的宝库，因此它们常



常出现在我的《道德与政治》(Moral und Politik)一书当中。其次,我还关注于如何拓展各种艺术形式的范畴,尤其是悲剧性和喜剧性这类普遍概念(参看我的专著《伍迪·艾伦》(Woody Allen, 2007))。最后,在过去的数年间我采用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我的思想——例如讨论身心问题的对话录《Encephalius》,针对伟大的哥伦比亚“反动派”Gómez Dávila所写的反-格言录,以及讽刺短文《后现代的申辩》(Apologie der Postmoderne)。这一文学尝试开始于《哲学家的咖啡馆》(Das Café der toten Philosophen, 1996)这部已经被翻译为13种语言的书,书中收录了我与一个小姑娘之间真实的通信。我们在信中虚构了在哲学家咖啡馆中进行的对话,尽管这些通信的真实性被许多书评作者质疑,但其中最美丽的构想确实总是来自于小姑娘Nora。

10. 正如您刚才谈到的,您的哲学写作采用了多元的文学形式。除了您所谈及的文学本身所蕴含的哲学维度,当您关注哲学的文学形式时,是否也考虑到了接受的维度,即其与世界的关联?

康德区分了哲学的学院概念(Schulbegriff)与世界概念(Weltbegriff)。当哲学意欲作用于世界时,它便不能仅仅书写专业论著;它必须面向更广大的受众:既朝向其理智又朝向其心灵。因此,哲学必须复兴传统中存在的文学形式,正如启蒙时期的伟大



思想家那样。

11. 由于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学派的影响,中国许多柏拉图研究者也关注对话录的文学形式。您如何评价施特劳斯的柏拉图解释?

施特劳斯认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哲人出于对迫害的恐惧常常在他们的政治和宗教哲学中将一些观点隐藏起来,我觉得这一发现是有价值的。但希腊仅存在着很少的对渎神(Asebie)的迫害案例(目前被证实的仅有三例,即阿那克萨戈拉、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渎神的指控只是一个托词,迫害者真实的意图是清除眼中钉或政敌的盟友)。柏拉图从不隐瞒他对于民主制的否定,他所隐瞒的乃是未成文学说,这一学说与政治毫



无关涉。施特劳斯竟然宣称，柏拉图并不严肃对待他的理念学说，这在我看来无疑是荒谬的。

12. Hösle教授，您刚刚度过了50岁的生日。根据柏拉图的理论，您现在正处于一个哲学家生命的巅峰时期。您能否简略介绍一下您目前与未来的研究计划？

我正在为C. H. Beck出版社写作一部德国哲学简史。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之后，我对于德国哲学传统的特殊之处，也就是它和英法诸传统之间的区别很感兴趣。但我还有另一个长远的计划：我打算写一部客观-观念论解释学专著，所谓客观-观念论解释学即关于何为合法与非法解释的理论。这部作品的规范性立场将使之迥异于迦达默尔及其后现代追随者。

教化

1. 在《哲学家的咖啡馆》一书中，您涉及到了教育的诸多面相，此后您又写作了数篇文章讨论相关问题，并尝试进行教育实践。我们从中看到了教化(Bildung)这一特殊的德意志概念对于您的深刻影响，但由于教育体系的巨大变革，以塑造整全之人为目标的传统教化理念如今已经显得过时了。如果您觉得这一理念没有过时，那么它对于当下的意义何在？

正如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便已承认的，现代的成功正是基于专家(Fachmenschen)理念；但缺乏精神与教化的专家应为我们时代的诸多问题负责。想想环境问题——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企业经济理性并不把作为整体的自然当作其思考的框架。真正的教化必须矫正专家主义(das Fachmenschentum)；专家自身也必

须融入知识之整体。

2. 自博洛尼亚法案实施以来，德国已经部分改用美国的高校体系。然而我们注意到，德国却并未接受通识教育的体制。您对美国的通识教育如何评价？这一制度是否有自身的缺陷，如果有，应该如何改进？德国未接受这一制度是否因为其不适用于德国，或者仅仅是这一改革考虑不周？

与德国大学相比，美国大学凭借其学院体系(Collegesystem)更接近于中世纪的大学理想：和德国的情况不同，在美国人们只能在四年的通识教育之后再行进行医学或法律的学习。德国则没有这样的学院系统，因为德国中学此前部分地替代了这一系统。但遗憾的是，如今的中学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因此我担心，德国的教育系统很快就将显示出



更多的缺陷。不过德国在外语学习这一个方面仍保持着优势，美国中小学与学院不可饶恕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外语教学——这自然也因为目前几乎每个受教育者都学过英语。

3. 您之前提到，您离开德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德国学生质量堪忧，您觉得今天的德国学生与您那一代的学生相比，差距主要在哪里？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衰退？

在1968年之后，德国建立了很多新的大学，并且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进入大学学习。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却未能同时成功地创造一个以绩效为基础的公正市场体系。大学学习在美国是一种投资，而在德国它却被当作一种生活形式提供给许多年轻人。此外，很多教授获得了同他们前辈同等的权利。然而，尽管这些权利对于那些有着极高阶层伦理的前辈而言曾有着积极意义，但对于这些后辈而言却过度而不合时宜了。

4. 2009年圣母大学成立了高等研究院(NDIAS)，由您出任院长，而您主编的文集《一所天主教高等研究院的理念》(The Idea of a Catholic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也于今年出版。您能否在此简略谈谈何为一所天主教高等研究院之理念？圣母大学高研院与别的高研院相比有何特色？

圣母高研院在两个方面出类拔萃：与天主教传统相一致，我们不仅希望支持那种综合了规范性与描述性维度的研究，还希望能促进跨学科的项目。Verum-bonum-pulchrum(真、善、美)是我们研究院的铭文——善(bonum)将我们与著名的普林斯顿



图为2009年柏林洪堡大学洪堡雕像上的抗议博洛尼亚教育改革标语，意为：“人人皆优秀”



高研院标志相区别。希望中国学者也踊跃申请我们的项目！

5. 在圣母高研院委员会名单中不仅有神学、文学、哲学专业的教授，还有化学家和工程学家，在您看来这样一所研究院相对于各个独立院系的优势是什么？

在对于保证专业质量不可或缺的单个系科之外，大学还需要设立一些机构来处理那些只能借助于多种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未来的大学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此类研究跨专业问题的机构。

6. 我们谈了很多公共生活中的教育问题。最后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在私人生活中您是如何教育您的孩子的？您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道德乃是我们的出发点——几乎没有别的作家能像狄更斯一样帮助我们塑造对此的感知，我已为我的孩子在晚间朗读了九部他的小说。就智性而言，我觉得重要的是，他们能理解自身出于好奇而希望了解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机械性地记忆。他们必须把握对世界历史的知识，以此作为统括其他知识的框架，而古代希腊与罗马则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基础——眼下我正每晚为他们朗读普鲁塔克。Q



革命叙述的兴起

——高华访谈

特约撰稿人 灵子（北京，liufang0815@gmail.com）

七月的南京已是酷暑，高华手捂着左腹，身穿长衣长裤从书房走出。一月份因癌症做的伽马刀手术副作用极大，加之怕影响大脑而拒服止痛药，他至今每日疼痛。但他始终以惊人意志忍耐，精神矍铄，谈话中偶尔因身体不适离开小憩，也从未露出异样神色。

高华是历史学界众人服膺的学者。2000年，他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在香港出版，系第一次有学者全部利用大陆已公开资料做出的扎实梳理，系统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后过程及影响。

2010年1月，高华的史学随笔《革命年代》出版，这是大陆第一次公开出版他的作品。本书收录了他近年来35篇对民国十年、革命词语等问题的研究文章，尤以《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等引人注目，角度独辟蹊径，专门从历史被建构的过程追溯还原历史本真。

今年7月1日，恰逢建党九十周年，满街红歌飘扬，访问者前往高华在南京的家中探望，并请教有关中国近现代革命中话语建构的诸种问题。



高华近照



建立革命叙述的两个传统

您一直注重从革命话语叙述的角度研究近现代史，比如对中共而言，这套话语的建立对其建立政权助力很大，但同时也埋下很多隐患。希望在此能系统地梳理一下这条线索。

二十世纪中国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革命叙述。中共如此，早期国民党也是如此。这有两方面传统。一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开始的社会变革，需要有一套新的叙述。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皇权统治天经地义，那么怎样让大家认为它有问题呢？先是提改良，后来发现改良的路不顺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激进派就提出要推翻它，于是就建构了满汉对立、种族革命的新解释。这是中国留日学生受到西方新思潮、包括日本本身的新思潮的影响。应该说这套解释在发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传统来自苏联，它给出了相对准确的概念。

既然有中国自身的传统，为什么北洋时期没有自己的说法？

1912-1927年的十多年里，北洋政府统治中国，没有建立新解释。所以今天一些年轻一代的朋友，甚至学界的朋友，有时会开玩笑地讲，中国最好的时期是北伐之前，因为北



洋时期有相当的思想自由，结社自由，国会有参、众两院，初步的公民社会开始成长，经济增长也很强劲等等。当时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人士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中国在各方面都落后，应该全面拥抱西方价值，包括西方的制度建构和思想观念，袁氏称帝失败后，就连北洋军阀的主流也被这种看法所“裹挟”，而不敢提出对立的看法。北洋武夫虽有枪杆子，但理不直，气不壮，反而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因为一开始北京就有了国会，最多时有上百家报纸，大家已经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嘛。

当然，面对某种社会思想界的改变或学者的行动时，北洋的社会舆论也有词汇来表



述。比如对学生的某些激烈行动，对马克思主义派，他们称之为“过激派”，但这些词语只是现象之描述，没有进入到对性质的准确把握。后来所谓新的理论，都是从莫斯科来的。

苏联在革命话语架构方面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哪些？

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浓厚。苏联先是给国民党提供了一套解释。比如，它明确提出，现阶段中国要进行国民革命，要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是国共两党共享的一套词语，是大家都接受的。另外还有一个口号“劳工神圣”，实际上已经带有共产党的某种阶级诉求了，但国民党觉得也能接受。

苏联给共产党的更多。最初中共成立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要建立共产社会，这在中共一大纲领里已提出来。但是当时就那么几个人，怎么建立共产社会？所以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现阶段要反帝反封建，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与其他民主派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但是在统一战线中要占据领导权。这些是诸如陈独秀、李达这些老先生们，自己创造不出来的，他们就是看本子，是要莫斯科指点迷津的。这些概念到了中国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它好像跟中共党人的感觉一致。如果不一致，慢慢就被淘汰了。

这么说国共两党都很迅速地意识到了革

命理论的重要性？

对。但是国民党和中共有个最大的区别：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都是理论家，国民党只有一部分理论家，大部分是行动家。

国民党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有帮会分子、资本家、学生、华侨富商，专职的理论家只有戴季陶等少数人。但共产党里面许多是理论家。一大的十三个代表，包括最初几届党代会的核心人物，不少是大学生。共产党应该是工人阶级党，但是一到中国就有了自己的特点，成了知识分子党。在一大二大三大，这个知识分子党没有太大的发展。到1923年三大，全党也就是几百多人，还是局限在一个知识分子理论讨论俱乐部的框架下。当然这时已经有一些行动，比如“中国劳动组合”，希望在工人阶级里面能发挥一点影响。二十年代初，苏联人在中国调查，要找他们在中国的支持力量，选来选去，觉得还是国民党比较适合。因为那时国民党力量最大，成立最久，有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发现在广东的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很大。马超俊就是国民党里最早搞工运的。所以，最初在工人阶级中影响大的，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那时的共产党比较国际化，成分很单一，而国民党比较中国化，里面什么人都有，像帮会分子，潮州帮、宁波帮什么的。

共产党一开始还不太懂这些东西。它早期就是用《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



义ABC》来办几个小杂志，《劳动者》、《劳动界》、《劳动音》，如果共产国际的钱一不来，杂志马上就停了。所以在我看来，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帮助，主要是三个：理论上的帮助；经费的支持，以后还有干部的培养。干革

命是需要钱的，这个时候还没有以后的打土豪分田地，钱从哪儿来？今天披露的大量史料证明，没有钱，他们想去广州出个差，十多块钱的车票都付不起。

国共话语的分化

那么中共的宣传是从何时形成大规模影响的？

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是由中共包办的。毛泽东在国民党内起家，是因为汪精卫看中他的才华，让他做国民党内宣部的代部长。毛泽东对理论有兴趣，但跟书斋式的理论家又不同，他办过国民党内宣部的刊物《政治周报》，有实际经验。所以国民党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不是真正的国民党搞的，而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国民党称为“跨党分子”）操办的。

最初中共的领导人都是理论家，到了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几个人还在争论，布哈林就讲，滚出你们的共产主义教研室！自此以后就是李立三、周恩来等行动派占据上风，当然在莫斯科的安排下，他们是需要得到斯大林真传的“理论派”的“帮助”的，理论派最后的夕阳残照，有几个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博古、张闻天。其实，如果仔细分析，王明固然可以称得上是理论家，

博古就谈不上，他是留苏派中间的行动家，当然博古的俄文很好，在延安翻译了不少马列名著。王稼祥写过几篇文章，但谈不上是理论家。真正有理论的就是张闻天。

行动派上台，是当时的革命形势需要。因为大家发现，空谈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最现实的问题是：党要生存。这个时期中共就开始有自己的理论，从与国民党共享的革命话语中间分化出来，形成自己鲜明的阶级意识的独特话语。这套话语主要强调两个特点：阶级斗争；诉诸底层。

也就是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才建立了和国民党不同的意识形态？

大革命之前已有萌芽，比如刚才说的“劳工神圣”，已经带有凸显工人阶级作用的特点。后来，“劳工神圣”演变成“打倒土豪劣绅”，甚至一段时间还出现了“杀杀杀，杀尽一切反革命”——这个后来也淡化了，被认为是“左倾盲动”，把它算到了瞿秋白的帐上去了——但这套凸显阶级斗争和暴力革



命的精神一直继承了下来，以此重新组织阶级队伍。

阶级队伍很重要，过去党的骨干力量多是知识分子，行动派上位以后，知识分子很多人都离开了，变成左翼知识分子。（当然，有些人虽然脱离了共产党组织，但是写小说、做研究，满头脑还是共产党意识。）这时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上山的上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毛泽东，以及各地很多的上山、起义，迅速农民化、迅速中国化；没有上山的就在上海变成“密谋革命家”，开始我们熟悉的地下党生活：联络三教九流，保卫中央机关，暗杀叛徒、秘密接头，每天都高度警惕。

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呢？原来负责宣传的中共分化之后，他们的话语出现什么变化？

国民党也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对内，它用很中国化的、比较温柔敦厚的四个字，就是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这是蒋介石提的，在蒋的嫡系内颇有凝聚力。对外，就是“反共剿匪”，也有号召力，起码在1927-1931年“九一八”之前是有效的，因为这种提法满足了民族资产阶级愿望。民族资产阶级怕共产党怕的不得了，光是“共产”这两个字就让他们发抖。今天我们听得太熟，已经不去想这层意思了，现在听说不少企业家和大明星非常崇拜毛，抢着要入党，他们可能没学过《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讲过，《共产党宣言》，一言以蔽之，就是消灭私有制，并且和传统观念做最彻底的决裂。我估计新入党

的大学生，也不学《共产党宣言》吧，呵呵，这是题外话。国民党骂共产党为“土匪”，因为中共在农村搞的就是打击、消灭地主的暴力革命，很像历史上劫富济贫的农民造反军，但毕竟中共是有思想有组织的政治军事集团，在思想上是有强烈追求的。“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和历史上梁山泊式的起义军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还有一点，共产党除了有中国文化的背景，也有国际背景，瑞金和延安都有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梁山泊的宋江108将，他们和“远方”可没有什么电讯联系，也没有外国顾问和联络员，更得不到“远方”的金钱援助。

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口号是“抗战建国”，不仅要抗战，而且要在此过程中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所谓“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国民党的军、公、教，全国的大中小学生，都会说这句口号。国民党对共产党，1937-1945年，表面上是国共合作，共产党在重庆有代表团，实际上对中共也很防范。国民党一直以“正统”自据，它的词汇也有进攻性，大革命时期，用“跨党分子”称中共，就有一些贬意。抗战后，在内部先用“异党”，后用“奸匪”、“奸伪”暗指中共，大家一看就知道说谁。我查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档案，连张治中这位国民党内的温和派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也用此语指称中共。毛泽东也厉害，他和蒋一度是棋逢对手，毛发明新词“反共顽固派”、“摩擦专家”，互相戴帽子。



国民党的“抗战建国”口号，听起来也不错，也符合民众期待，为什么效果不佳？

这个口号固然不错，但惠及百姓的实事做得太少，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另外，宣传不是空对空的，必须要依托组织。共产党从来都是有组织的，每个支部里都有宣传委员，建国初至1958年，学苏联的方法，在全国建“宣传网”，连工厂车间，农村生产大队都有宣传员，负责出黑板报，刷大标语等。国民党没有这样的依托，只有几个理论家，在三十年代写写文章，抗战期间主要是靠叶青（又名任卓宣，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二十年代初留法支部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被国民党抓住枪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之后投降国民党，被认为是托派，他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1940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毛泽东主义批判》，没有形成几个朗朗上口的中心概念，文笔不流畅，影响也不大。

抗战时期两党像打乒乓球一样打来打

去，共产党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指责共产党游而不击、保存实力；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传播面不一样。在共产党统治的区域是共产党影响大，实现了思想全覆盖。蒋介石要比其他国民党高官或民主人士老道许多，所以中共领袖说他是“集古今中外一切反革命之大成”，他在1944年日记中写道，共产党在边区已造成“极权制度”。但在国统区应该说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还是国民党宣传作用大，但是国民党远没有创造出针对中共的，能支配人心的观念。比如，根据地军民一开口就会讲“毛主席”，“边区政府”，“三三制”等，当然，国统区百姓也都会讲“蒋委员长”，国民党虽有“领袖至上”，“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却不能使这些口号广泛社会化。是非他愿，还是做不到？我看主要还是后者，1947年，蒋介石就多次提出要学习共产党在延安的做法，但国民党的体制、结构、话语系统和那些是两码事，实在是力所不能逮。

左翼文化占领国统区

说到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三十年代即便在国统区，也是左翼文化盛行。为什么国民党占据统治地位的地区，依然不能在思想领域形成主导？

左翼文化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

党是很世俗化的党。虽然它似乎想做到思想统一，但从来没有踏踏实实去做，当时的中国也缺少实现思想独裁那个大的环境条件，严格讲在大陆时代它不是极权主义的党。

国民党的思想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中国所谓正统思想；二是苏俄的一党专政思



想，包括领袖独裁、思想控制，蒋介石三十年代就非常羡慕德、意和斯大林；三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思想 and 体制的影响较大。国民党的组成，尤其最初辛亥的元老，基本都是华侨资产阶级、华侨知识分子。再严格的说，国民党代表的是都市，1937年之前，它的势力基本在东南沿海地区，代表中国近代的工商文明。所以它要进行的革命是有限革命，即到夺取政权为止，而不是无限革命。

它在思想领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总理纪念周”，要求读三民主义，实行“党化教育”，大中学都有党部，大专学校里还有“职业学生”，但都是一般性的例行公事，控制色彩比较淡。它也颁布了一些检查禁令，但落实的渠道有限。比如丁玲有几本书虽然是禁书，但换个封面还能出版。另外，三十年代在上海有租界，租界成为共产思想、自由思想的传播点，国民党对此没有办法。

除了国民党控制薄弱之外，可能还因为中共宣传太强大？

鲁迅有句话比较准确，说在一般国家革命失败了，革命文学就衰落了，但中国不一样，革命的失败带来革命文学的昌盛。大革命失败以后，大批作家、诗人、小资产阶级文学爱好者，从北伐的火线下下来，到上海写写小说，骂骂国民党，在亭子间里面抒发一下革命情怀，还可以活下来。这批人在那儿慢慢聚集起来，成为一种力量。用意大利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话讲，这批人是“有

机化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组织化知识分子”，是以宣传革命为志业的人。他们跟胡适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后者对探究知识、传授知识兴趣更浓，但前者是天生的革命家。这就出现葛兰西讲的一种情况，“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地方，实现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中国的情况最典型。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有左翼电影、左翼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小组、苏联之友社、摄影家、美术家、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方方面面，都是共产党组织的。

上海这个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历来非常严重，特别容易产生具有反抗意识的左翼知识分子。我很多年前有次到上海，朋友带我去一个友人家。他的家就在波特曼大酒店附近，一条破旧的里弄，耸立着一排破败的小楼，左曲右环地爬上窄窄的楼梯，昏暗的小灯泡，旁边都是各家锅碗瓢盆。好不容易到了那个小房间，窗子一打开，“疑是银河落九天”，对面简直是星光灿烂。我当时就说，这个地方绝对是产生左翼作家的摇篮，是“愤怒的一代”天然的滋生地。当年那批人的情况也类似这样，吃了上顿没下顿，想着还有一篇稿子没有卖掉……这种环境使他们愤世嫉俗，成了国民党的反对派。其实他们基本上是小知识分子，大多数出生在“非劳动人民家庭”，到了延安之后也还要进行思想改造的。

除此，不能忘记的一点是，中共的解释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苏联是一个活生生的巨大的存在。而这个时期，当你在思想上



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看法，你就会自动地过滤掉任何对苏联不利的描述，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间天堂。你去听一听苏联作曲家杜那耶夫斯基三十年代创作的那首被誉为“第二国歌”的《祖国进行曲》吧，此曲1936年5月由苏联电台播出，很快就传到了中国，北京的一些左翼青年马上就会唱了。它是多么激动人心，使人心潮澎湃啊！歌词写道：“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像在这块土地上那样自由呼吸”，呵呵，有意思吧，要知道这是1936年，几年前的乌克兰大饥荒，无数的自耕农拖家带口被押送到北极地区劳改，许多人死于途中；第二年的1937年，又有残酷的“大肃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音乐家在高谈“自由呼吸”，这就

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有这么多左翼思想的追随者。

国民党有概念但没影响，是因为它没有严密的组织来贯彻宣传吧？

它有组织，但是这个组织是空壳化的。国民党在上层有组织，但也是稀稀松松，在“南京十年”，从来没听说过国民党高官要“过组织生活”，倒是不少高官要坐京沪快车去上海度周末。国民党到省以下就基本涣散了，完全没有办法把宣传推行下去。

共产党最重要的两翼，一个是组织，一个是宣传，当然它的核心是军队，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共赖以存在的三要素。

领袖的创造力

大革命之后，中共行动派上台，理论方面有什么不同？他们以行动著称，却也没有抛弃理论解释的权力。

共产党若没有理论解释，无以标示自己的特性。行动派不是理论家，他们依靠和服从那批斯大林的弟子们。

大革命之后，阶级意识强烈了。革命话语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把“我们”和别人区别开来，区分“我们”和“你们”。“我们”是自己人，“你们”是敌人或者可疑的人。比如

“同志”这个词，今天无所谓，过去这个词不得了，被称呼“同志”像有了一张入门券一样。如果对哪位老先生只称“先生”不称“同志”，他难过得很。有的时候搞得很神秘，说你就留在党外吧，你在党外的影响更大之类，把民主人士说得一愣一愣的，既激动，又失落。第二个特点，有斗争的作用。第三，还有动员的作用。一套语言本来只是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联系，但是经过跟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互动之后，就产生自己的生命了。



中共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联合战线中发展壮大，此时它的阶级特性还不明显。到1927年湖南农运，开始斗土豪，有了阶级特性，但还没有提出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一直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提出建立政权，中共就开始凸显新阶级属性，就有自己的新革命话语了。

这套话语怎么更契合中国，中间又经历一个过程，它的完成是在延安时期，王明、瞿秋白提供的也是中共的解释体系，但是如何更适合中国的需要？毛泽东此时就开始用苏联经验和中国底层造反文化传统进行重新组装，一切为了现实服务。所以中共武装化以后，从表面上看，确实有强烈的农民造反色彩，稍微不注意的话，还以为是农民造反军，但是它有两个新因素；一是有党；二是有意识形态，且对这个意识形态有一套不复杂的解释。这个解释很重要，能产生凝聚力。另外，今天再看，它是通过不断的与对立面的斗争和党内斗争，把党巩固下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个人的因素也有很大作用吧？比如对理论的创造能力。

对，领导者创造新概念的能力影响非常大。结合中共的发展来看，毛泽东自创概念的能力特别强，很多东西也不是无源之水，但是他非常聪明，受到一点启示就能触类旁通。比如他读苏联的《联共党史》，马上想到中共党史也可以如此编写。过去，毛不被认为是理论家，但他能抓住几个关键

概念，再加以延伸、发挥和创新，看上去好像是非正统，跟马列讲的不完全一样，但核心又差不多。毛讲过几句很有名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讲得就很有道理，这是他对暴力革命的强调。有的人一辈子读马列，没有行动，最多就是一个马列专家，而他是变成行动，而且给造反充分的合理性解释。他有很多这样的词语，都极具个性特色、针对性很强、能得到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认同。他的对立面，不知道什么原因，书生气都比较重。

毛不单创造能力强，而且有本事通俗化。

对，他有简化、通俗化理论的能力。你跟那些大部分是文盲的党员去讲马克思、斯大林，他听不懂，但是讲造反，讲打天下，讲共产，他能听懂。所以在我看来，中共其他理论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毛的。陈伯达之所以以后能被毛看上，也是因为他会用中国的若干概念来汇通马列的概念，所以毛一用他就用了几十年。毛曾经表扬刘少奇，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那是客气话。毛有领袖的地位和优势，他可以有几套语言系统，交替使用，而别的领导人由于身份限制，只能讲一种话。他则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党内领导层用一套语言；对农民出身的高干用一套语言；对知识分子党员则另用一套语言；和国民党搞统战时再



INTERVIEW

换一套语言系统，如此等等。在必要时，他也可以在领导层讲“山寨”语言。那位“文艺革命的旗手”也非同小可，她也是没一点书卷气，在大上海的水银灯前，她能快速入戏；在陕北的窑洞里，她也能因地制宜，抄抄写写；她既会讲“文艺复兴”和《简爱》，在文革期间也会当着重要领导人的面自称“老娘”，训斥党政军高干。

1949年建立共和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是否面临新的转变？

是的。建国初期，彭真和董必武都讲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的。不搞运动了，它就面临转型。革命的目的实现了，不能再永远斗争，或者说斗争的方式要转变了。这个转型是非常困难的。Q

（本文得到熊景明女士与胡杰先生的鼎力支持，特此感谢）



鲸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 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網易 博客
blog.163.com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 欢迎订阅, 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 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